

共力新天地：日治時期高雄地區的沖繩人士群樣

撰文／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文獻處副研究員 蔡承豪

摘要

日治時期，諸多來自日本沖繩縣的移民前抵高雄，原因多元，過往研究卻少關注。就被刊載於官方職員錄及人士鑑等資料內族群來觀察，眾多行政機構與學校提供具相關背景且有意更上一層樓的沖繩人士從事公職（行政、司法、地方、稅關）、教職（校長、教師）、醫事與警察等職務之契機，當中尚不乏士族出身者。而新興的貿易與工業港市則提供欲經營工商者大展身手之天地，除擔任代理商、出張所主任，並有自行開業者。前述人士就籍貫來觀察，以沖繩本島的那霸地區最多，另不乏來自八重山群島者。

於基層勞動人事方面，高雄港區為重要貿易口岸、工業重鎮及遠洋漁業基地的新興地區，諸多就業與發展契機，在消除國境障礙與建立交通網絡後，吸引了較適應南方風土氣候、具一定專業技能，得從事勞動事務與服務業的人士。當中男性多為受僱勞工及漁業——尤其從事捕撈鮪魚、採集海人草與貝類等之遠洋漁業。女性則多從事服務業、家事幫傭，亦有工廠任職者。而人數眾多的基層移民，主要聚集於高雄港區一帶的湊町、新濱町、堀江町與入船町等地，並以湊町為最。移民間更發展或加入相關組合、互助會等，除進行交誼，更藉此維護自身權益。沖繩人士的到來，實為高雄這個移民城市增添了多元與國際的風貌。

關鍵詞：那霸、八重山、湊町、遠洋漁業、海人草

本文先蒙「2020年第四屆『寫高雄——屬於你我的高雄歷史』出版及文史調查獎助計畫」提供支持，讓筆者對於故鄉的歷史研究得有更多助益。後並獲審查人提供諸多精關修正意見，另承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莊天賜研究員協助相關事宜，在此一併深表謝意。

投稿日期：2023年3月13日

接受日期：2023年7月19日

To Make Joint Efforts in New Ground: Okinawans in Kaohsiung During the Japanese Rule Period

Cheng-Hao Tsai

Associate Researcher, Department of Painting, Calligraphy, Rare Book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NPM

Abstract

During the Japanese rule period, many Okinawan immigrants arrived in Kaohsiung. There are many factors for their arrival in Kaohsiung, but few related studies. From the information in the official director and celebrity director, it can be found that numerous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and schools provide Okinawans with relevant backgrounds who are interested in advancing to the next level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dministration, judiciary, local, customs), school (headmaster, teacher), medical and police career opportunities, and many famous families among them. The emerging trade and industrial port city provides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personnel with great opportunities to showcase their talents. In addition to acting as an agent, director of a branch office, and self-employed. Their native place is most from Naha. In addition, there are many people from the Yaeyama Rettō.

For grassroots workers, Kaohsiung Port area is an emerging area of important trade port, industrial center and pelagic fishery base. After the removal of border barrier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many opportunities for 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have attracted people who are more adaptable to the southern climate, have certain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are able to engage in labor affairs and service industries. Among of them, most men are employed laborers and fisheries—especially pelagic fisheries such as catching tuna, collecting kelp and shellfish, etc. Women are mostly engaged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domestic help, and some work in factories. A large number of basic level immigrants mainly live in Minato, Xinhama, Horie, and Irifune in the Kaohsiung Port area, Minatomachi is the most. Immigrants further develop or join associations, friendly societies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nd to protect their interests. The arrival of Okinawans adds a diverse and international look to Kaohsiung, an immigrant city.

Keywords: Naha, Yaeyama, Minatomachi, Pelagic Fishing, Digenea Simplex

- 壹、前言
- 貳、「國家」架構下的人員與物資流動建立
- 參、沖繩移民數額概況
- 肆、「刊載」的沖繩人士——以公職與商業為中心
- 伍、勞動移民的在地生業與日常生活
- 陸、遠洋謀生
- 柒、影響概觀
- 捌、結論

壹、前言

高雄是個移民色彩鮮明的城市，除從臺灣本島及外島之縣市，更有遠自海外地區移入者。來自四方的移民，於不同階段，因著不同目的，說著不同語言、在這片土地上尋求新的契機。在日久為他鄉後，進而落地生根繁衍，讓高雄豐添多重面貌，並在人員與物資流通間形塑了城市的多樣性。

進入日治時期，統治階層的更替使高雄地區迎來了日籍官吏與軍隊進駐，亦漸次吸引了工商勞動等各式外籍人士前來。隨著日本本國的經濟成長，加以臺灣總督府在控制與分配殖民地資源的政策考量下，選定打狗港作為南部主要的進出口貿易港，開啟臨港鐵路建設打狗築港計畫，擴築打狗港為新式港口，讓南部地區製糖產品、農業物資及工業原料等得以藉由近代化的海陸設施快速輸出，並使打狗港從傳統漁村躍升為高雄港市，帶動整體地區的發展。而近代漁業的蓬勃發展，及日本南進政策確立下使高雄成為化工及軍需工業重鎮等因素交織下，更促使了高雄社會經濟各方面突飛猛進的發展，讓來自於澎湖、臺南、屏東、嘉義，甚至於北部的客籍人士前來尋求契機，吸引了更多日籍人士渡海前來，當中並包括了沖繩縣籍人士。

固然在清代已有部分飄風海難事件造成少數琉球人士意外到來，但非定期往來，亦無定居者。至日治時期，因地理相近與就業機會等多重因素，臺灣方成為沖繩人士外移主要選擇地之一，來到高雄者樣貌，除從事商貿、漁業、工業等活動而集中於臨港地區，並有分布於各市街庄內從事公教職者。這些人士的到來，豐富了移民群像，而他們於各行各業的活動，也成為以不同觀點了解高雄歷史文化的切入點。

相對於北部的基隆、臺北與宜蘭等沖繩人士主要聚集地，他們為何選擇相對地理位置正處於對角線，距離較為遙遠且不易自行乘船抵達的高雄，對於城市移民史的研究而言，實是一值得挖掘的課題。固然迄今關於日治時期沖繩人士移居臺灣的研究已有全面性的彙整，¹關注在高雄活動者亦有若干積累，如又吉盛清與呂青華主要側重在高雄的沖繩移民分布與生業活動概況之調查與介紹。²而石丸雅邦與末武美佐則依其研究之職業別，對日治時期的琉球籍警察與教師進行了詳細的彙整研究，當中連帶涉及了在高雄任職者的資料，可作為延伸探討的基石。³金戶幸子則是針對八重山地區女性來臺謀職的因素與影響有深入的探討，當中亦略呈現了在高雄的案例。⁴黃于津與李文環等人則透過鼓山戶政事務所的戶籍資料，分析在哈瑪星及鄰近地區沖繩籍人士的分布情況。⁵但整體而言，相對於基隆、臺北等地，專論日治時期在高雄地區⁶沖繩移民活動之研究相當有限，多偏重在點狀及靜態的描述，並未系統性與貫時性來解析其生活樣貌及物資流動，對於高雄地區歷史人群多元面貌之建構實有缺憾。

故本文除參考先行研究，並將運用白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公文類纂、官報等檔案及官方刊物，民間出版的相關人士鑑，教育類、產業界之相關期刊記載，日治時期的新聞報導，以及可回溯日治末期琉球漁民活動樣貌的戰後初期報導等，尚輔以相關行政輿圖。而曾於高雄活動的沖繩人士眾多，本文主要先進行整體概況的彙整與描述及建構基礎的

- 1 代表性的研究者為又吉盛清，參見又吉盛清，〈大日本帝國植民地地下の琉球沖繩と台灣：これからの東アジアを平和的に生きる道〉（東京：同時代社，2018）。
- 2 又吉盛清，〈大日本帝國植民地地下の琉球沖繩と台灣：これからの東アジアを平和的に生きる道〉，頁 374-375。呂青華，〈戰後在臺沖繩人的處境——高雄「入船町」個案〉，收於曲金良、修斌主編，〈第十二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北京：北京圖書，2010），頁 419-431。
- 3 石丸雅邦，〈琉球人理蕃警察職員〉，發表於「第三屆臺日原住民族研究論壇」，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主辦。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行政大樓（2010 年 8 月 27 日）。末武美佐，〈日治前期臺灣公學校的沖繩籍教師（1895-1918）〉，《臺灣學研究》，11（2011），頁 59-85。其中石丸雅邦所探討的琉球人士，尚包括原屬琉球王國奄美群島出身者。
- 4 金戶幸子，〈1930 年前後的八重山女性の植民地台灣への移動を促したプル要因——台灣における植民地の近代と女性の職業の拡大をめぐる〉，《移民研究》，3（2007），頁 1-26。
- 5 黃于津、李文環，〈日治時期高雄市「哈瑪星」的移民與產業——以戶籍資料為主的討論〉，《高市文獻》，5（1）（2015），頁 6-37。黃于津，〈日治時期高雄市「哈瑪星」社會構成之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 6 高雄地區的定義，除居民的慣行指涉，更與官方的行政區劃改制息息相關。旗津、鼓山、鹽埕一帶原被概稱打狗地區，與周遭地域在日治時期被劃歸為打狗支廳等行政單位治理。至大正 9 年（1920）臺灣總督府進行地方改制，於南部地區設立高雄州，改轄高雄郡高雄街。大正 13 年（1924），高雄郡高雄街廢止，改設立高雄市（州轄市）。後市區並逐漸擴張，所指之市區範圍亦隨之變化。而鑒於討論的豐富性，本文討論範圍原則上並不侷限於港區一帶，係以今高雄市為範圍。惟因避免混淆，行文中以「高雄地區」稱呼現今的範圍，「高雄市」則指日治時期的高雄市。若有特別指稱範圍，將標明打狗、湊町等小地名，而今鹽埕區、鼓山區南端等日人聚集地，則以高雄港區泛稱。

人物表列，以圖補闕前述之空白，並重塑沖繩移民曾於高雄地區與在地人士共力生活的歷史軌跡，藉此豐添高雄人群的多元風貌。⁷

貳、「國家」架構下的人員與物資流動建立

皆位於東亞島弧的琉球與臺灣，地理位置上雖然接近，但過往基本上並無穩定的定期往來。然隨著兩地陸續被納入日本領土後，透過「國家」所搭建的架構，以及兩者間的推力與拉力影響下，情況出現了變化。

一、納入同一統治架構

琉球群島是一狹長的南北弧狀島群，臺灣與島群南端的先島群島（宮古群島、八重山群島與釣魚臺列嶼）相鄰，距最近的與那國島僅相隔約 110 公里，至沖繩本島也在數日航程之內。早期兩地雖有若干交流，但非屬經常性的往來。⁸即便進入 18 世紀，可能在日本嚴格限制與海外進行接觸的大環境下，文獻可見的雙方互動事件仍然有限，僅有因海難的偶然交流。形式包括琉球船民漂流到高雄沿岸，或是漂流到非高雄的鳳山縣轄域、東部地區後，生還者再因求救、護送等因素而進入高雄境內者。前者如嘉慶 20 年（1815）琉球國芭蕉島哪吧村人安里等 13 名漂至打鼓洋面事件。⁹後者如嘉慶 15 年（1810）發生於臺灣東部的琉球麻姑山籍建西表等 42 人船難變故，生還者後由鳳山縣

7 （1）本文行文間，將依內容所需交錯使用琉球與沖繩等字樣，惟為符合當時行政建置，基本上以沖繩為優先。（2）琉球王國原轄有之奄美群島，後被日本政府割裂併入鹿兒島縣，以致在文獻中涉及到鹿兒島籍者，並不會另行區分其為原琉球人或日本人，故本文原則上並不討論在奄美大島的琉球人士，而係視個案情況註明。（3）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有相當數量之沖繩籍士兵與平民疏開者來到臺灣或高雄地區短暫性停留或暫居，係屬戰時波動性因素，故本文原則上並不討論前開人士。

8 黃智慧，〈人群漂流移動史料中的民族接觸與文化類緣關係：與那國島與台灣〉，《臺大考古人類學刊》，52（1997），頁 30-31。黃紹恆，〈戰前臺琉關係之的建立、開展與客家人遷移〉，《客家研究》，7（1）（2014），頁 118。

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琉關係檔案·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94），頁 1156-1163。

負責聯繫與運護，途中並經過高雄地區前往府城。¹⁰

雙方互動頻率的大幅提升，則待進入日治時期。其原因除了兩者間來自於琉球群島的外推力及臺灣的吸引力外，並因同處日本帝國當中相對邊陲位置的臺灣與琉球，藉由日本政權統治為「橋梁」的架構下，而得以在同一國家權力框架中進行較密集的往來。

臺琉兩地原皆不屬於日本（即便琉球雖自 1609 年「慶長琉球之役」後已被薩摩藩實質控制），但以同治 13 年（1874）「牡丹社事件」為觸發點，原仍保有某種程度主權的琉球王國先是在明治 12 年（1879）被明治政府強制「廢藩置縣」，以設置沖繩縣的形式納入日本行政區劃。明治 28 年（1895），臺灣則因中日甲午戰爭後所簽訂《馬關條約》下被割讓予日本，儘管日本接收臺灣時在各地遭受到臺人蜂起反抗，最終仍被納入日本版圖。惟不同於琉球，臺灣係被作為殖民地來統治。

就國家治權的視角而言，雖兩地的行政體制不同，但仍同屬於日本這個國家體制，兩地間沒有所謂國界的區隔，臺琉人民往來屬於國內移動，意即沖繩人士進入臺島時除了特殊情況，基本上並不需要辦理繁複的入境程序，降低了移動障礙與成本。在日常辦理行政程序時，也由於同屬一個國家體制，可依循官方制定的申報與處理程序。而同樣以日語作為「國語」，在學校或日常習得日語者，無論在公部門或私人間，溝通時可減少翻譯的成本與曲折，並得以擴展溝通的人群範圍。對於有心發展者，在受過教育，另通過受訓、國家考試或取得資格認定等後，便可依循體制，申請相關軍公教職務。尤其對於受日語教育成長的世代，選擇的就學與就業範圍除了沖繩地區，尚可延伸至臺灣。

加以在殖民者對新領地物產資源與人力調配引導，使得兩地人民與資源得以有較大自由且流暢的形式往來，提升了相互流動的契機。如由國家力量主導獲批准的近代交通設施，使得移動成本大幅降低，沖繩人士可利用較頻繁且具規律性的海上運輸抵達臺灣，而一旦登上臺灣，除了於登陸地點就近活動與就業，更可使用各式陸路交通網絡移動，甚至因而得以前往過往甚少接觸的高雄地區。沖繩與臺灣間先是有日臺間

10 參見蔡承豪，〈海難救助與地方掌握——嘉慶 15 年臺灣東海岸的琉球船難事件〉，《臺灣風物》，71（4）（2021），頁 75-108。其他相關案例可參見劉序楓，〈嘉慶七年（1802）琉球貢船的臺灣遭難事件——以琉球使者楊文鳳的見聞記錄為中心〉，收於朱德蘭、劉序楓、廖肇亨編，《萬國津梁——東亞海域史中的琉球》（臺北：中琉文化經濟協會，2015），頁 115-144。

由近代輪船所構築的航線串連，可定期運載兩地人民往來。明治 29 年（1896）5 月 1 日開始的內臺航路，每月三次，依次為「神戶—門司—長崎—鹿兒島—奄美大島—沖繩（那霸）—八重山（石垣島）—基隆」，這條航路使臺灣與琉球間有了定期的通路。至同年 9 月，航線有所調整，先是廢除停靠長崎，隔年 3 月廢除該航路。自 4 月起，改設立經過門司（當時也停靠宇品、長崎）直航內臺的「神戶—基隆」線，以及經過沖繩的「神戶—基隆」線。同月起經沖繩線每月運行三次，其中一次停靠八重山。自明治 31 年（1898）3 月起至 6 月底，該航路延伸至高雄（經過地為鹿兒島、沖繩、八重山、基隆、澎湖島、安平），自 7 月起每月兩次停靠八重山。明治 34 年（1901）4 月起，再將該航路固定至高雄，隔年 4 月起停靠八重山減為每月一次，然該航路在明治 39 年（1906）便不再定期。¹¹

雖沖繩直抵高雄的海上交通航路時有變動，但仍可先搭乘定期航班抵達基隆。另臺灣琉兩地地理空間接近，尤其是琉球群島西南隅的八重山群島，與臺灣北部相距 100-200 多公里，在國境阻隔的消卻下，若有一定噸數的堅固漁船，可自行抵達臺島。而在臺灣鐵路、公路等建設逐步完備，使得島內移動得以有更穩定的運輸設施，節省了交通的成本並提升了往來的安全性。明治 33 年（1900）先有臺南—打狗間的鐵路通車，南北縱貫的「基隆—高雄」西部縱貫線並於明治 41 年（1908）完工啟用後，這樣近代化交通設備的完成，使島內南北往來的路程可縮短至一日內完成。故沖繩移民若欲前赴高雄，可以選擇搭乘船運先在基隆、宜蘭等地上岸，再循陸路前往，「沖繩—（海路）—宜蘭、基隆、臺北—（鐵路）—高雄」的途徑，成為快速的移動管道。而公路設備的漸次完善，亦有助於島內的移動遷徙。兩地通訊設施的建立，則使人群間的訊息交換得以更有效率。故部分琉球漁民就利用漁船往來於沖繩與臺灣之際，進而移動到西南部的高雄，再以此為基地，赴臺灣南方海域、東沙群島一帶從事漁業。此外，為擴展沖繩產業的發展契機，沖繩本地的產業視察團也曾前來臺灣，並造訪高雄。¹² 兩地間另時有水產交流與調查。¹³ 這種不定期的交流，成為沖繩人士瞭解高雄的另一項途徑。

11 〈沖繩臺灣間的定期船〉，《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06 年 4 月 1 日），第 4 版。

12 〈產業視察團抵臺南〉，《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13 年 3 月 29 日），第 5 版。〈沖繩人の爲めに〉，《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0 年 12 月 29 日），第 6 版。

13 〈沖繩から水産調査に來臺〉，《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6 年 11 月 12 日），第 7 版。

二、推力與拉力

而部分沖繩移民願使用前述的架構中在臺琉間移動，係肇因於沖繩地區的推力及臺灣的拉力。

沖繩群島由於自然資源有限，耕作面積不足，加以長久以來的階級制度，除了農漁業外，能創造就業機會的項目有限，難以撫養增長的人口。且受到被日本併吞的影響，在政治及社會等層面對於沖繩人士的壓制與不友善對待，導致了部分居民開始選擇遠走海外，使得沖繩地區成為近代日本國內主要的移出區之一，在各道府縣中名列前茅。¹⁴而 1880 年代以降，隨著夏威夷糖業擴張需要大量人力及美國西部開發邁入大建設時期之際，對於中國移民進行限制，反使讓日本逐漸興起一股前往海外的勞力移民潮，在官方的安排及移民網絡下，越來越多的沖繩人遂漸次前往夏威夷、美國本土，甚至於在 1898 年美西戰爭後成為美國殖民地的菲律賓。至 1910 年代，隨著美國對日本移民限制漸趨嚴格，勞力移出轉向同樣缺乏願意投入農業與勞動生產專業人力的南美洲等地；另隨著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勢力伸向南洋群島地區，由於沖繩移民較適應高溫潮濕的氣候，且聘用工資較其他日本府縣者低廉，故成為南洋地區的日本移民當中最具規模的一股。這些離鄉背井的沖繩移民，在懷抱著於異國覓得新機的決心，加以親族的引導，逐步擴展於上述地區。¹⁵至 1920 年代，受到日本經濟慢性恐慌波及的沖繩，出現百業蕭條、就業困難的情況。加以國際砂糖價格大跌，重擊琉球地區的經濟，陷入所謂「蘇鐵地獄」¹⁶慘狀，不少沖繩人士被迫前往日本其他府縣及海外尋求契機，使移出人數在 1920 年代中葉起驟增，至昭和 4 年（1929）至海外者已超過 4,000 人。¹⁷

除了前往海外，鄰近同屬日本統轄的臺灣，則提供了沖繩移民另一項選擇。眾多沖繩移民的前來，除了前述的推力，並反映出臺灣的吸力。占領臺島，對日本而言是將「帝國的南門」轉移到臺灣，意味著沖繩的地位相對地下降。加之沖繩的社會設施及基幹產

14 石川友紀，〈沖繩県における出移民の歴史及び出移民要因論〉，《移民研究》，1（2005），頁 11-14。

15 石川友紀，〈沖繩県における出移民の歴史及び出移民要因論〉，頁 14-18。松田ヒロ子，〈沖繩の植民地的近代：台湾へ渡った人びとの帝国主義的キャリア〉（京都：世界思想社，2021），頁 31-51。

16 即因在無法取得米、薯等食材情況下，此時期的民眾選擇蘇鐵作為主食。雖琉球地區食用蘇鐵係有長久的歷史，亦有去除其毒素之技術，但仍引發若干中毒事件。

17 黃紹恆，〈戰前臺琉關係之的建立、開展與客家人遷移〉，頁 119。

業等的整頓較為遲緩，很多人為求職，只好渡臺來。相對於前往海外，前來臺灣的手續與時程都便捷許多，無須通行證或旅券，也不一定要仰賴中介機構，可藉由親友網絡甚至於以低廉的運輸成本自行動身渡海抵臺。故在日本領臺初期，已可見沖繩移民、商人與女性前來臺灣北部。即便日後在臺日人的徵人廣告或啟事偶可見附加但書：「謝絕琉球人與本島人」，部分機構也不採用沖繩移民。¹⁸ 沒有中介機構的安排或契約保障，也可能受到在臺日人的排擠，相對自由的環境使得沖繩移民可以自行找尋工作，基本上仍有諸多勞動與幫傭工作可以選擇。尤其隨著臺灣諸多建設的展開及農工商產業的擴張，加以部分投資者同時在臺琉兩地活動，牽引了諸多就業契機與人員流動。¹⁹ 對於年輕的沖繩女性而言，到臺灣工作是令人憧憬的事情。²⁰ 而高雄作為總督府設定的南部重要港市，鐵路的興築、三期的打狗／高雄築港工程、市區改正及各機構的建置與製糖、重工業及軍用工業的發展等，在在需要大量勞動人力。各式企業本店、分公司及派駐據點，則需要經營人才，這些都給予了沖繩移民大展身手的空間。而臺灣的學校數量較多，因工作舉家遷臺之際，也可提供子弟較多的教育選擇。²¹

除了民間的工作，軍公教等官方職務也提供了沖繩人士發展的機會。在明治 28 年（1895）出兵臺灣之際，已有若干沖繩軍伕前來。在武力征臺實質領有後，對於日本而言，馬上面臨到新領地需要眾多「統治」所需的人力，尤其是通曉日語的人員，這便給予若干在被納入日本版圖，在日本同化政策下受日本近代教育的沖繩人士就業之機會；且放眼整個日本統治範圍當中，臺灣總督府的官僚規模更名列前五名，較易有職缺。²² 在整體文官體制中，沖繩人士或尚難與日本本地人士競爭，但受制於對臺灣的刻板印象而抑制了某些日本官僚前來的背景，相對較有競爭機會。且沖繩人士適應南方氣候，而臺灣對於沖繩人的貶抑意識又較日本內地輕微，在一些雇員、傭人等領域上並可有彈性的契機，來此不啻是可嘗試獲得機會的新天地。而在殖民地任職，日本籍官僚得有在勤加，雖然時代、地區上多少有些差異，但在臺灣、朝鮮等地區的增俸基本上可達六成，

18 又吉盛清，《大日本帝國植民地下の琉球沖繩と台灣：これからの東アジアを平和的に生きる道》，頁 74。

19 又吉盛清，《大日本帝國植民地下の琉球沖繩と台灣：これからの東アジアを平和的に生きる道》，頁 69-99。松田ヒロ子，《沖繩の植民地の近代：台灣へ渡った人びとの帝國主義的キャリア》，頁 53、60-61。

20 三木健，《聞書西表炭坑》（東京：三一書房，1982），頁 67。

21 松田ヒロ子，〈植民地台灣から米軍統治下沖繩への「帰還」〉，《文化人類学》，80（4）（2016），頁 552。

22 岡本真希子著，郭婷玉譯，《殖民地官僚政治史：朝鮮、臺灣總督府與日本帝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9），頁 33。

另尚有部分津貼等優遇措施。²³ 在需求與誘因下，在日本領臺初期，即可見來臺從事軍公教職的沖繩移民，並透過官僚制度的派遣與配置，進入高雄地區。

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有些沖繩人民為了逃避徵兵而選擇來臺。至大戰末期，更有上萬名的沖繩民眾被疏散至臺灣，²⁴ 應是臺琉間最大量的一波移動潮，不過隨著戰爭結束，這些暫時停留的人員幾乎都返回原鄉。

上述原因，促使了琉球移民來到臺灣。而前往高雄，則有更細緻的原因，待下文說明。

三、物資牽引：「八重山炭」的流入

除了人員，在日治初期，因為火車運輸需要煤炭作為動力，已有所謂「八重山炭」，即八重山群島的西表島所生產之煤炭開始進入高雄地區，拉出兩地的另一項關聯。

領臺後，臺灣總督府體認到鐵路在交通及統治上的重要性，一面重新規劃北部的路線，另一方面自明治 32 年（1899）起，鐵道部開始大規模整建往南的縱貫鐵路。而煤炭品質甚攸關鐵路運轉效率，但根據鐵道部初步觀察，臺灣北部的煤礦品質不甚理想，煤礦燃燒率及供給力都非稱穩定，故計畫針對臺灣及日本多個產地的煤礦燃燒效率來試驗，以圖找出最經濟且品質穩定之燃燒動力，也包含八重山炭。²⁵

自明治 32 年（1899）開始，由大倉喜八郎（1837-1928）於明治 6 年（1873）創設、與日本陸軍與臺灣總督府關係甚深的大倉組開始交付煤炭，²⁶ 部分可能也用於火車運轉燃燒測試。明治 35 年（1902），鐵道部決定大規模使用八重山炭來進行運轉試驗，故於 6 月時公開招標採購 120 萬斤的八重山炭，最後由沖繩開運會社的林禎之助（輔）以平均一萬斤 70 圓以下的價格標得。這樣的金額就鐵道部而言相當划算，因其評估，即便臺灣煤礦於每萬斤僅約 30 圓，但在當時南北缺乏穩定陸路交通之際，包含運送到打狗港所需的相關手續及搬運費將超過 70 圓。²⁷

23 岡本真希子，〈殖民地官僚政治史：朝鮮、臺灣總督府與日本帝國〉，頁 159-242。

24 當時沖繩縣人口約 32 萬。

25 臺灣總督府鐵道部，〈臺灣鐵道史（下卷）〉（臺北：臺灣總督府鐵道部，1911），頁 135-137。

26 高橋春吉，〈臺灣の鑛業〉，《日本鑛業會誌》，606（1935），頁 591。三木健，〈沖繩・西表炭坑史〉（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1996），頁 203-204。

27 〈鐵道部石炭の入札と八重山炭〉，《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02 年 6 月 26 日），第 2 版。

鐵道部於明治 35 年（1902）首次進行八重山炭的測試，共 43 種的樣本中，有 3 種樣本只使用八重山的石炭來行駛，6 種樣本是以一定比例混合八重山和臺灣出產的石炭來行駛。結果在排名上，混合的兩種樣本分居第七名和第八名。因此，總督府做出了如下的評價：「今後將使用混合石炭，以補本島出產石炭之缺點及不足之處。」雖總督府對於八重山石炭的供貨能否穩定，仍抱持不安的看法，²⁸但基本上仍延續以八重山炭作為燃料主力。除了品質，低廉價格更可能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而大倉組雖然首年競標失利，後仍獲得了西表島煤礦的運銷事務。²⁹

即便臺灣北部煤礦開採規模日漸擴大，明治 41 年（1908）西部縱貫鐵路完成，南北人貨往來便利性大為提升，但是鐵路運輸能量的限制、天災的干擾，及貨物稅等問題，仍困擾著臺灣北煤南送。加以南部製糖工廠的擴大對於燃料需求的提升，使得即便臺灣北部煤礦的價格幾乎與西表島所生產者相近，以海路運送的八重山炭仍得以持續保有臺灣南部市場。³⁰此外，因築港工程所需，臨時臺灣總督府工部有甚大的燃料所需，以用於開鑿、疏濬、填設等各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船運費用及煤價皆屬高漲之際，八重山炭仍屬相對便宜者，可與臺灣本地燃煤分庭抗禮。³¹即便一次大戰後，日本內地煤礦及撫順煤礦再度重新移入，八重山炭仍占進口半數以上。³²後至 1920 年代初，臺灣產煤已達 35 萬噸，西表島約僅能供應 1.5-2 萬噸，然在前述各種因素下，尋求市場的八重山炭與缺煤的臺灣南部仍形成了產銷間的互補關係。³³

在此商貿情況下，八重山地區的煤礦會社也來到高雄設立據點，如前述八重山炭即於高雄設有出張所，並由屬於琉球資本的丸一洋行負責運銷。³⁴主事者為沖繩縣首里區儀保町出身、畢業於沖繩縣第一中學校的桃原良毅。³⁵在物資的帶動下，連帶若干沖繩人士隨之來到高雄。

28 臺灣總督府鐵道部，〈臺灣鐵道史（下卷）〉，頁 135-141。

29 〈八重山石炭と臺灣労働者〉，《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06 年 1 月 27 日），第 2 版。

30 〈石炭と輸送費〉，《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12 年 2 月 18 日），第 2 版。〈輸入炭激增〉，《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12 年 10 月 14 日），第 2 版。

31 〈大正八年・臺灣貿易概況〉，《臺灣時報》，9（1920），頁 58、63。

32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大正三年臺灣貿易概況〉，《臺灣商工月報》，74（1915），頁 16。〈本島炭業の現勢及將來（一）〉，《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0 年 11 月 2 日），第 2 版。

33 許世融，〈關稅與兩岸貿易 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4），頁 20-21。

34 〈福建施設と人物（四）〉，《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12 年 2 月 21 日），第 3 版。

35 內藤素生編，〈南國之人士〉（臺北：臺灣人物社，1922），頁 337。

參、沖繩移民數額概況

在日治時期，在高雄有多少來自沖繩的移民？雖日治時期有相關人口統計，且隨統治的進展，日籍人士來臺者穩定成長，當中也包含諸多沖繩人士。惟在一般的「現住人口」與「常住人口」統計³⁶當中，大項往往僅會區分「本島人」、「內地人」、「朝鮮人」、「中華民國人」與「其他外國人」。在「本島人」則另依種族再區分，但「內地人」項下多半無再細緻標示來自哪一個道府縣，僅能利用少數國勢調查及地方人口統計來觀察。

一、全臺概況

依據臺灣總督府的歷年統計書及《國勢調查》所刊載的數據，在明治 31 年（1898）在臺灣的沖繩移民有 332 人，男性約占七成。至明治 44 年（1911）時約有 1,000 人，大正 9 年（1920）約有近 2,500 人，至 1930 年代中葉則已約有 10,000 人。在二戰末期（1944）的沖繩戰役，約有 14,000 人向臺灣疏散，又因日本戰敗，從南方撤退來臺的，合計二戰結束時約有 30,000 名沖繩人在臺灣。至二次大戰結束，根據官方統計，計遣返沖繩人士 13,917 人；但根據琉球方面的資料顯示，從臺灣返回琉球的人數統計則約達 32,000 人。³⁷而在日治期間，因出差、考察、研修、參加觀光團、探親、漁撈、做生意、來臺賺錢等的自由往來者及加上進入中學、師範學校、女校、大學等就讀的人，在臺灣有過生活經驗的人應不只有三萬人，而是這個數字的數倍之多。³⁸

日治時期來到臺灣的日人，以九州及中國等地區較多，包括鹿兒島、熊本、福岡、佐賀、長崎、大分（以上九州地區）及廣島、山口（以上中國地區）等縣。沖繩雖亦是人口移出區，且鄰近臺灣，但在日治前期來臺者有限，在整體來臺日人中比例約占 2% 以下。但至 1920 年代中後期以降，比例逐漸上升至 3-4% 間，在各府道縣中擠進前十

36 現住人口係以實際居住為準，由「現住人口」中扣除「一時現在」並加上「一時不在」之人口，則為常住人口。

37 黃紹恆，〈戰前臺琉關係之的建立、開展與客家人遷移〉，頁 121-122。何義麟，〈戰後在臺琉球人之居留與認同〉，《國史館學術集刊》，18（2008），頁 138。

38 沖繩県文化振興会公文書管理部史料編集室編集，〈沖繩と台湾〉（沖繩：沖繩県教育委員會，2000），頁 46。

名的行列，推測應與前述的 1920 年代沖繩地區經濟蕭條有關。在昭和 5 年（1930）的國勢調查中，即可見在臺的沖繩移民當中，居留在臺灣僅 1-5 年者超過半數，若加上居住 6-10 年者，則超過八成。³⁹ 而後沖繩籍人士的比重更逐漸攀升，顯示來臺人員增加的趨勢。

二、移居高雄的人口數量

來到高雄地區的沖繩人士，若以明治 34 年（1901）開始施行的「二十廳」時期的蕃薯寮廳及鳳山廳兩個涉及今高雄地區的行政區為範圍，⁴⁰ 該年在兩廳居住的沖繩人士計有 13 人，至明治 38 年（1905）也僅有 43 人，主要多在鳳山廳境內。相對於距離沖繩較近，且為統治中心的臺北、基隆等地，以及南臺灣的傳統中心——臺南地區，至 20 世紀初期，來到高雄地區的沖繩移民著實相當有限。⁴¹

而後由於並無區分日本各行政區的移民人數統計，難以做連續性的觀察，但隨著臨港的打狗地區陸續啟動鐵道建設、填埋海埔地營造及築港等工程後，帶動港區的快速發展，使其成為高雄地區人口增加最快速的地區，這一帶的地位逐步提升，取代舊有的行政要地——鳳山。更以之為中心，逐步擴展了「高雄市」⁴² 的規模。大正 13 年（1924），高雄街廢除，升格設立高雄市（州轄市），隔年並實施町名改正，市區劃分成 14 町。後陸續納入岡山郡左營莊下轄的桃子園、前峰尾，新南群島，整個左營庄，原隸屬鳳山郡鳳山街的籬仔內、五塊厝，鳳山郡小港的草衙、佛公，鳳山郡鳥松莊的灣子內、本館、赤山西側，原屬楠梓庄的楠梓、土庫、後勁等地，使高雄市規模擴大至總計下轄 34 大字及 14 町。⁴³ 這樣的興盛並直接反映在人口的增加，打狗地區除了本地人口的成長，日籍人士也大量遷入與自然成長。明治 37 年（1904），打狗人口約 6,552 人，至明治 41

39 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昭和五年國勢調查結果表 全島編》（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34），頁 474-483。

40 蕃薯寮廳轄域亦包含了今臺南的南化區，惟因現今可見的相關統計數據並無區分至如此細緻，故並不另行特別剔除討論。

41 明治 34 年（1901），臺北廳、基隆廳及臺南廳內的沖繩人士，分別為 96 人、33 人及 63 人。

42 以下所稱之高雄市，係指日治時期而非今日之直轄市。

43 關於高雄市空間變化之圖像化，可參見葉高華，〈高雄市擴大史〉。資料檢索日期：2023 年 5 月 3 日。網址：https://mapstalk.blogspot.com/2010/12/blog-post_4423.html。

年（1908）已增加為 8,579 人。明治 45 年（1912）築港完成後擴增為 14,681 人，至設立高雄州的前一年（1919），打狗的人口更已突破 2 萬人。而日籍人口則從僅占約 15% 的比例，成長至突破 40%。至昭和 8 年（1933），高雄州內計有 32,295 名日籍人士，約占全臺 12.6%，光是高雄市便有 18,667 人，占高雄州所屬近六成的比例；若扣除今屏東地區，則占將近八成的比例，可謂是州內日人的主要集中區。至昭和 17 年（1942），高雄市的日籍人口則成長至 40,573 人，占高雄州所轄約 62%，並占全島 10.54% 之比例。

在日籍人口成長的趨勢中，也包括沖繩人士的增加。隨著築港工程以及後續的漁業發展，應自 1910 年代初期來到高雄地區的沖繩移民人數開始有較顯著的增長，如又吉清盛便推斷入船町一帶的沖繩漁民聚落形成約在 1910 年代前期。⁴⁴ 若以高雄州全州的範圍來觀察，大正 9 年（1920）在高雄州的沖繩人士計有 336 人，昭和 5 年（1930）成長至 918 人，五年後則達到 1,347 人。至於各地方的情況，自昭和 5 年的次級行政區為例，可見全州超過四分之三的沖繩籍人士居住在今高雄地區，且近六成高度集中於高雄市境內（表 1）。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表 1 昭和 5 年高雄州內沖繩籍人口統計表

	人數	性別	人數	占全州沖繩人士比	占地區日人比
高雄市	532	男	268	57.95%	3.47%
		女	264	(75.89%)	
岡山郡	35	男	16	3.81%	2.94%
		女	19	(4.99%)	
鳳山郡	94	男	49	10.24%	5.33%
		女	45	(13.41%)	
旗山郡	40	男	20	4.36%	3.42%
		女	20	(5.71%)	
小計	701	男	353	76.36%	3.58%
		女	348		
屏東郡	104	男	48	11.33%	1.82%
		女	56		
潮州郡	26	男	16	2.83%	2.88%
		女	10		

44 又吉盛清・《大日本帝国植民地下の琉球沖繩と台湾：これからの東アジアを平和的に生きる道》・頁 374-375。

(續上表)

	人數	性別	人數	占全州沖繩人士比	占地區日人比
東港郡	34	男	22	3.70%	4.36%
		女	12		
恆春郡	53	男	33	5.77%	6.24%
		女	20		
小計	217	男	119	23.64%	2.63%
		女	98		
總計	918	男	472	100	3.30%
		女	446		

表格說明：() 內之數字係以今高雄市範圍為母數之比例。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昭和五年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 高雄州高雄市》(臺北：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32)。經筆者加總計算。

若以更細緻的戶籍資料來觀察，根據黃于津與李文環統計鼓山戶政事務所有關哈瑪星地區的戶籍資料，日治末期居住於湊町（今鼓山區壽山里、惠安里、延平里、新民里一帶）的日籍人口，以九州地區的移民最多（37%），沖繩籍移民次之（16%），第三的是中國地區的移民（12%）。⁴⁵而就單一縣籍，沖繩籍移民在三、四丁目占所有日籍人口當中最高者，比例分別為 27%、17%，靠近柴山的五丁目則僅有 3%，這應與沖繩移民多從事與港口、漁業相關行業以致居住地（或寄宿地）的偏重有關。而湊町一至五丁目的沖繩籍人口分別為 49、303、566、171 與 23 人，合計共 1,112 人，亦即光是湊町，便超越了昭和 5 年（1930）整個高雄州的沖繩籍人口。而於同屬於哈瑪星之一部，約等於今鼓山區麗興里與維生里一帶的新濱町一、二丁目，則有 66 人，占日人比例的 8%，而日籍人口增加最多的一年為昭和 19 年（1944），共 55 人，當中以沖繩縣籍占最多數，有 16 人。⁴⁶綜合上述情況，可看出日治晚期沖繩人士移居高雄的趨勢。

至於今鹽埕區的範圍內，沖繩籍人士比例則排名第四，顯示該地區同樣有相當數量之沖繩籍人口。⁴⁷

而根據民國 34 年（1945）12 月底因應戰後遣返的調查，居住在高雄市者琉球人士計有 1,929 人，包含了「一般琉僑」，奉准留用者與其家屬、與「殘留琉僑」三類，人

45 黃于津、李文環，〈日治時期高雄市「哈瑪星」的移民與產業——以戶籍資料為主的討論〉，頁 15。

46 黃于津，〈日治時期高雄市「哈瑪星」社會構成之研究〉，頁 22-30。

47 李文環，《高雄第一盛場：鹽埕風》（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21），頁 95。

數分別為 537、259 與 1,133 名。⁴⁸ 不過考量到部分漁民可自行離開返鄉或前往他處，約兩千人的靜態人口大抵可視為日本殖民統治結束時在高雄地區活動的沖繩人士低標。

肆、「刊載」的沖繩人士——以公職與商業為中心

自晚清成為通商口岸的打狗地區，在控制與分配殖民地資源的政策考量下，臺灣總督府選定其為南部主要的進出口貿易港。而築港工程的展開不僅使打狗港轉變成為現代化港口，也帶來工商業發展的契機。隨著高雄港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加上港口管理制度的影響及南進政策下的臺灣工業化推展，經貿活動的擴張等各式因素，使臨港地區逐漸建設成為臺灣商貿、重化工業與軍需工業的核心。⁴⁹ 而周遭的傳統聚落也穩定成長，於經濟發展及整體死亡率降低等大環境因素下人口數量漸次攀升。故殖民政府有鑑於此，遂於地方陸續設置及擴張行政、司法、警察、海關、學校等各式單位，以因應國際商貿、產業獎勵、行政統治與教育推行等層面。



一、「刊載」的出版品

在這樣的背景下，吸引了眾多懷抱不同目的的沖繩人士前來高雄，或短期駐足，更有落地生根者。當中部分人士並被「刊載」於當時公開出版品上，揭露其姓名、原籍、現職、經歷、家庭情況甚至於私人興趣等。這些出版品樣式繁多，係因進入日治時期，隨著近現代社會更趨頻繁的社會互動與商貿往來，加以印刷媒體的發達及識字率上升等因素，相關人物指南與簡介成為一項新興的出版品，為沒有網路與視訊媒體時代查找當時社會領導階層或是商界要角的重磅指南。主要可概分為數類，包括：1、官方的職員錄，2、官方或民間所出版的人士鑑、人物誌、紀念誌等，3、各社教、商工、聯誼團體所發行的團體名簿，4、地方志或地方大觀，5、報章雜誌報導等。就內容連續性與資訊完整

48 臺灣省日僑管理委員會編，《臺灣省日僑遣送紀實》（臺北：臺灣省日僑管理委員會，1947），頁 183。

49 謝濬澤，〈從打狗到高雄：日治時期高雄港的興築與管理（1895-1945）〉，《臺灣文獻》，62（2）（2011），頁 211-244。王御風，〈日治初期打狗（高雄）產業之發展（1895-1913）〉，《高雄文獻》，2（1）（2012），頁 58-75。

程度而言，則以前二類為要。

戰前日本各官廳的職員名、隸屬單位、官等、俸給，會清楚記載於《職員錄》這樣的刊物上，在日本本國由內閣印刷局每年出版，當中也記載各殖民地官廳之職員。若只看《職員錄》，會覺得臺灣總督府與其他殖民地官廳並無二致，但臺灣總督府每年還會刊行僅限臺灣部分的職員錄——名稱依時期而異，包括《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等。當中有部分內容和本國所記相異者，即除少數幾年，幾乎在整個殖民時期的官吏姓名下方都會明白記載民族出身，而這樣的標示正給予了辨識任職人員籍貫的線索。⁵⁰而再搭配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以及臺灣總督府府報及各地方的州、廳報等，便更能看出特定人員的職務變化概況。此外，各地方單位也會發行各自的職員錄。

由官方或民間所出版的各式人物誌、人士鑑等，類似西洋流行的「WHO'S WHO」，提供特定時空、空間下的各界名流概況。編輯者會挑選具代表性的人物，並刊載其出生地、身分、職位、經歷、事蹟、地址、電話、家庭等，並有個人之小傳，部分人士尚有照片。而紀念誌則是針對特定事件進行人物收錄，往往有其姓名、住所、籍貫與長短不一之事蹟。藉由這些人士鑑所揭露的出生地或籍貫，以及各式經歷，可資判斷其是否來自於沖繩並且落腳於高雄的各行各業當中。有時雖因更動其戶籍至日本內地（主要是東京），但亦可透過別的管道分析後再進行比對，增補其活動的足跡。

二、人員類型

從第一類的《職員錄》及相關公文類纂、地方官報等，及第二類的《大眾人事錄》、《台灣關係人名簿》、《芝山巖史》、《芝山巖誌》、《南國之人士》、《南部臺灣紳士錄》、《南臺灣の寶庫と人物》、《建功神社誌》、《專賣事業の人物》、《新臺灣を支配する人物と産業史》、《臺灣人士鑑》（各版）、《臺灣人事態勢と事業界》、《臺灣紳士名鑑》、《臺灣警察遺芳錄》與《警察職員錄》等刊物中，將籍貫標示為沖繩、且曾在高雄地區任職者先行擇出，再依公、教、警、醫事、商及司法等職業別進行初步

50 岡本真希子著，《殖民地官僚政治史：朝鮮、臺灣總督府與日本帝國》，頁 48。

的區分彙整如附錄一，可見歷年有 315 位在高雄地區活動的沖繩籍人士被刊載，當中以公職最多，計 207 人，後依序為 82（教）、12（警）、6（醫事）、4（+2）（商）及 3（司法）人。⁵¹

以這些人員來進行概況觀察，固然因為上述文獻材料偏重於公部門的部分，故數字上以公教警等人員為大宗，但此乃因從事公職人士有官方檔案系統性的紀錄，查找彙整相對容易所致。而商界人士較少，除了沖繩人士操持商貿活動者相對較少以外，更導因於缺乏大規模集中性的資料；且即便有民間編輯的人物誌，因能獲選入內者有一定篩選門檻，當任職員、助手者往往不會被收錄；且人物誌的規模又非如官方職員錄來的全面，導致可找出的商界人士數量確實有限。但前來高雄經商者，有從事代理商、出張所主任，並有自行開業者，顯示新興南方城市所提供的就業契機。

在公部門內，即便一般多指出沖繩籍人士較難擔任高階職務，但從高雄地區的案例觀之，則可見沖繩人士從事多類職項，包括公職（行政、司法、地方、稅關、鐵道）、教職（校長、教師、代理教師、雇員）、醫事（醫師、看護婦）警察與商務等。數額固然有限，但因執行行政之需，除都市內的官署外，得以點狀進入高雄各地的行政與教育機構，甚至達到一般勞動階層難以抵達的地域。且由於其具備的身分，可能也是某些地方的菁英或意見人物。另一方面，因高雄驛、稅關、郵局等機構的設置，而有若干沖繩移民被派來擔任基層公職人員。

從上述人員來做概略的分析，就身分而言，除了一般平民，當中尚不乏士族出身者⁵²。而在公職方面，日治初期已可見有沖繩人士以軍警公教等身分抵達臺灣。相對於日本本國及沖繩地區的飽和情況，殖民初期甚欠缺行政人員之際，若干本服務於軍隊者便較易在臺灣轉為行政職務。鐵路、港口、郵政等各項新設公共設施，亦或多或少提供了就業契機。故除了高雄地區的公署（如鳳山廳打狗支廳、蕃薯藔廳之各支廳等），鐵道部打狗出張所是早期來到高雄的沖繩人士主要聚集單位。明治 33 年（1900）3 月，打狗停車場（火車站）開工，而從明治 36-45 年（1903-1912）間，陸續有擔任書記（北川

51 本文主要運用《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網址：<https://who.ith.sinica.edu.tw/>）進行查找。而《職員錄》中有部分人員雖從姓氏推斷可能是沖繩人士，但因籍貫資料可能因遷籍而非標示沖繩者，則暫不納入討論。另高雄州自昭和 7 年（1932）起尚有《高雄州下官民職員錄》，惟因出版的年度相形較短且與《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的名單大致相同，故本文仍以後者為主要素材。

52 如少數從事漁業者亦具有士族身分，詳下節之介紹。

涉吉）與雇員（仲本則舜、源河朝伸、石原友賢、花城清成、垣花惠祥、喜納正松、友寄英寶、上原惠迪、羽地惠孝、源河朝興、友寄英真、花城長誼、平敷朝經、崎濱朝明）⁵³者任職。⁵⁴此外，專賣局打狗支局，打狗郵便局等單位，亦提供了日治前期的就業機會。

至日治中後期，隨行政體制的穩固以及地方公職的增設，在高雄擔任公職者主要轉向州、郡等地方公署、警政單位、醫院等，府屬的殖產、農事、稅務、交通，及與港務有關的稅關、燈塔等。而持續的高雄港築港更新工程，從 1920 年代後期再度提供了沖繩籍人士一批就業機會，如擔任雇員（大城安公、大城龜太郎、松浦朝一郎、上地安榮、國吉良和）、囑託（宮城直吉）及工手（松島朝一郎、大城安宅）等即從事較基層的職務。

在教育領域方面，前期的沖繩籍教師來源主要有二，包括來自於沖繩縣受教完畢取得資格者，另一則為畢業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者。前者如久高友貞、東恩納盛篤、平識政龜等，後者則有上原龜、東恩納盛亮、山城正鳴、外間政善等。在日治初期，距離臺灣最近的沖繩，要取得教員資格因需至日本本島應試，以至於先是在資格取得上就甚受經濟條件的制約，故得以取得資格並來臺者雖有，反較本州中西部之多數府縣為少。⁵⁵而來臺接受師範教育、取得資格並在臺灣任教，反而是較多有心於教育界的沖繩人士選擇。目前文獻中可見最早在高雄地方任職的沖繩籍教師，為明治 37 年（1904）擔任蕃薯藟廳蕃薯藟公學校教諭的上原龜，時年約 25 歲。而東恩納盛篤來臺後，則是先至臺東任教數年，於明治 39 年（1906）方轉往蕃薯藟公學校田藟分校。

至日治中晚期，隨教育政策下學校數量的增加，沖繩籍教師、代理教師進入高雄地區學校的人數更明顯增多，並轉向以在臺灣取得教師資格者為主。而有些沖繩籍校長、教師，並主要以南部為任教範圍，如外間政善、平識政龜、東恩納信等，生涯幾乎都在高雄、屏東地區任職。而隨沖繩籍教師人數逐漸增加，甚至有出現過東恩納盛亮與東恩納信兩者同時在旗山第二公學校（現旗山區溪洲國民小學）任教的組合。

雖多數職員錄並未記載性別，但從姓名來判斷，雖人數明顯較少，但仍可見有若干沖繩籍女性也進入公教醫事等領域任職。如在明治 42 年（1909）已有於打狗郵便局通信掛擔任電話交換手的伊佐ミツ，大正 3 年（1914）擔任同樣職務的石垣すゑ，及大正 6-7

53 人員名單依任職年代依序排列。

54 鐵道部打狗出張所於大正 2 年（1913）廢除。

55 謝明如，〈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頁 146-147。

年（1917-1918）間擔任打狗郵便局通信掛通信事務員の豐里カメ。而與世田末子則於昭和 8-9 年（1933-1934）間在高雄市平安醫院擔任看護婦。教職部分，大正 12 年（1923），有屋嘉ツル及安村サダ，分別在路竹公學校及林邊公學校擔任訓導。而隨日治晚期擴張學校數額，鼓勵孩童就學，更於昭和 18 年（1943）推行六年國民義務教育，讓更多的沖繩籍女性得以進入校園任教。至於警務及商業，目前則未見沖繩籍女性的紀錄。

三、人員試舉

能被刊載於前述出版品者，通常具有較高任務性質及自主性，且係有保障的穩定收入。而為更深入這些了解沖繩籍人士在高雄地區活動的大致概況，然考量到人數眾多，故擇取籍貫標示較為詳盡，或經歷紀錄較為豐富者，以附錄二列舉彙整。而為更深入瞭解人物活動樣貌，亦一併列出其在高雄以外之任職經歷，可觀察這些人士於就業與生活等層面的情況，可見有從日本轉職來臺，於臺灣多處間移動任職、或來臺就讀醫學校後在高雄開業者等之多元情況。

若就籍貫來看，來自沖繩本島的那霸地區⁵⁶，包括友利惠正、上運大（平川）先次郎、伊川長壯、宮城久安、神村孝太郎、山城正鳴、外間政善、宜保之春、宮良永昌等人。鄰近的首里區人數亦多，包括久高友貞、東恩納盛篤、東恩納盛亮、伊地柴清、桃原良毅及與奈原良哲。另也不乏來自八重山群島者，且花城長昱、高嶺方美這兩位都是在司法領域任職。⁵⁷

當中身為士族者，則有北川涉吉（公）、山城正鳴（教）、外間政善（教）、東恩納盛亮（教）、東恩納盛篤（教）、宜保之春（醫）、花城長昱（司法）等人，另有未在附錄二的國頭惠正（教）亦是士族。而在檔案中，另可見若干非沖繩籍的琉球士族曾在高雄服務，如身為琉球士族的山下雄輔，於明治 40 年（1907）從宜蘭廳稅務課轉至鳳山廳稅務課任職，惟其籍貫為鹿兒島。⁵⁸而即便身為士族，任職之路亦非能完全

56 那霸地區於明治 29 年（1896）先是設置特別行政區「那霸區」、後陸續併入鄰近之地區，另有築港所成之旭町，共 24 町。大正 10 年起改制為「那霸市」。

57 關於八重山群島來臺移民，可參見松田ヒロ子，〈沖繩県八重山地方から植民地下台湾への人の移動〉，收於蘭信三編著，《日本帝国をめぐる人口移動の国際社会学》（東京：不二出版，2008），頁 529-558。

58 「山下雄輔任鳳山廳屬」（1907 年 7 月 18 日），〈明治四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第十一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340039。

一路順風，如東恩納盛篤，他於沖繩縣尋常師範學校畢業後，先於沖繩地區的首里尋常小學校、恩納尋常小學校、熱田簡易小學校等校擔任訓導。來到臺灣後，則到了東部的臺東國語傳習所、臺東國語傳習所太巴塢分教場及其更名後的臺東廳太巴塢公學校擔任訓導，後轉任至蕃薯藔公學校田藔分校。即便曾被收錄於《南部臺灣紳士錄》，然卻又因罹患瘧疾導致身體衰弱之健康因素而不得不提出辭職。⁵⁹

部分人士在戰後仍與臺灣有關係，如與儀喜宣在戰後擔任負責琉僑遣返業務「沖繩同鄉連合會」的會長。另曾在鐵道部高雄事務所任職的神村孝太郎（1897-1988），於戰後曾擔任琉球政府行政副主席（1956年4月3日-1957年12月21日），期間即率貿易親善團來臺。而擔任過校長的東恩納盛亮，則在民國108年（2019）被屏東竹田的動漫活動轉化為漫畫人物，開啟了一項古今對話新連結。⁶⁰

伍、勞動移民的在地生業與日常生活

作為新興港市的高雄，無論建設、工商或服務業等皆須大量人力。此外，來高雄任職的若干日籍公商人士亦有家事服務需求，延伸提供了更多的就業契機，從事勞動及服務業等的沖繩移民也陸續前來，就人數與所占比例皆屬大宗。而為遷就就業通勤、加以較不具穩定的保障與財力，基於同鄉間互助援助的特性，除逐漸形成若干主要聚集地域，並結成同鄉（業）組織進行交流並維護群體權益。

一、在地生業

關於勞動移民的前來，又吉盛清推測，有別於前述軍警公教的沖繩移民可能在日治初期便因軍務、公務而陸續前來高雄，勞動與漁業移民移入高雄應在明治末年至大正初

59 「公學校教諭東恩納盛篤依願免官」（1907年7月12日），〈明治四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第十一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340035。

60 Facebook「竹田動漫祭」（2019年2月25日）。資料檢索日期：2023年3月3日。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takedaas/photos/a.1565248400484389/838889066453663/?type=3&_rdr。

期，這樣的移動與鐵路陸續完工及高雄築港應有甚深的關聯。⁶¹

明治 33 年（1900），臺南—打狗的鐵路通車，並於潟湖北岸的端點設立打狗臨時停車場，利用鐵路運輸的貨物可運送至此後再利用海運輸出。惟貨物從火車卸下後需利用駁筏從車站旁的後壁港，再沿著打狗川支流送至哨船頭的港口，多次轉運自甚不便，故總督府鐵道部遂於明治 37 年（1904）決議於鄰接海面處進行填海造陸工程，擴建打狗臨時停車場並興建新的運輸線，至明治 40 年（1907）5 月完工，即為鐵道埋立地。後陸續將停車場搬遷至南邊處，並建立起連接哨船頭和停車場間的濱線（はません），軌道兩旁並設置倉庫群以供使用，大幅提升打狗港的機能。而此年打狗港的貿易額並首次超越安平港，顯示蓬勃發展之勢，加以南北縱貫線通車，打狗港需負擔更大的運輸能量，後續的大規模築港工程隨之展開，以逐步提升運送能量。各項建設的投入，使高雄港區發展成為海陸運輸樞紐港埠，連帶促進產業發展、創造就業機會，因而吸引大量外來移民交相湧入。

面對新興向榮的港區，官方遂在港區一帶陸續展開都市計畫，於新鹽埕埔地區規劃了田町、山下町等新市街。⁶²在大力規劃下，哈瑪星——即湊町、新濱町一、二丁目與山下町一丁目（今鼓山區峰南里、登山里），以及屬今鹽埕區範圍的鹽埕町、北野町、堀江町、入船町、榮町等新市街，在港市一體的規劃下欣欣向榮，成為當時高雄重要的政商中心，並是興盛的商貿、工業與消費地域。⁶³當大正 9 年（1920）設置高雄州、高雄郡、高雄街等行政建置時，三機關之廳舍皆在哈瑪星。後高雄街改制為高雄市，市役所仍今高雄哈瑪星代天宮處，要至高雄州廳及高雄市役所因新建而陸續遷往前金（今高雄地方法院）及鹽埕榮町（今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後方有所分散，但主要人群仍主要聚集在在鄰近港區的哈瑪星與鹽埕區一帶。

大量移入的日籍移民當中，包含了眾多從事勞動及服務業沖繩人，除了就業者，往往也包括家眷。若依昭和 5 年（1930）調查的就業率來觀察，以高雄市最高，就業率約近一半。男性有業者整體超過六成，女性則未達四分之一。而在整體、男性與女性當中，皆以高雄市最高。

61 又吉盛清，《大日本帝国植民地下の琉球沖繩と台湾：これからの東アジアを平和的に生きる道》，頁 373-374。

62 山下町部分區域位於鐵道埋立地及淺野埋立地（即哈瑪星）。

63 李文環、蔡侑樺、黃于津、蔡佩蓉、余健源，《高雄港都首部曲：哈瑪星》（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15），頁 31-34。

表 2 昭和 5 年高雄地區沖繩人士就業率概況表

	整體就業率	男性就業率	女性就業率
高雄市	46.43%	65.30%	27.27%
岡山郡	34.29%	62.50%	10.53%
鳳山郡	31.91%	53.06%	8.89%
旗山郡	42.50%	65.00%	20.00%
合計	43.65%	63.46%	23.56%

表格說明：本表所計算之就業率，係指相對於整體人數的就業情況，用以呈現就業概況，而非是現今就業率計算以15歲以上民間人口為母數之計算方式。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昭和五年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 高雄州高雄市》。經筆者加總計算。

以高雄州內沖繩人士最多的高雄市來做更細緻的分析，昭和 5 年（1930）的就業情況大體如表 3 所示。整體的就業率將近一半，男性當中有業者約有三分之二，女性有業者僅約四分之一，反映此時期不少移民可能是攜帶家眷前來，故女性仍以從事家務為主。但在高雄地區範圍的一市三郡當中，高雄市的女性就業率較高，顯示港市在服務業、交通業及家事使用人等領域，得以提供較多女性就業契機。

表 3 昭和 5 年高雄市沖繩籍人士職業別

	總數	男	女
農業	2	2	0
水產業	23	23	0
工業	51	48	3
商業	51	20	31 (服務業：22)
交通業	50	39 (運輸：38)	11 (通信：10)
公教、自由業	39	32 (官吏公吏雇傭員：17；書記：10)	7
家事使用人	18	0	18
其他	13	11	2
無業	285	93	192
總數	532	268	264
就業率	46.43%	65.30%	27.27%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昭和五年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 高雄州高雄市》，頁28-33。

扣除公教部分，這些勞動人力所從事的行業大體可分為：（1）從事碼頭、商務的運輸勞力，（2）水產業（漁業），（3）以女性為主擔任服務業或家內幫傭者，（4）農業，

(5) 其他。當中水產業因至 1930 年代中葉後有相當比例是在遠洋作業，故於下節另行討論。

從事勞務者，從國勢調查以及戶籍資料的職業登記欄來觀察，從事農業者甚少，且非僅在高雄市，在整個高雄州中操持農業的沖繩移民皆不多。主要以受僱於工廠、會社、店鋪，並以從事工業、交通業、服務業與水產業——應即是漁業等為大宗。工業與交通業中的運輸業，需要較粗重的勞動力，故多為男性，但亦可見有沖繩籍妻子與丈夫一同在工廠上班的案例。⁶⁴ 商業則主要從事服務業，但也有擔任社員者，如沖繩縣立農學校第二屆畢業生仲本吉三郎，大正 5 年（1916）時便在高高的鈴木合名會社擔任社員。⁶⁵

至於女性移民就目前資料所見，主要從事服務業與幫傭。八重山群島的女性外出來臺工作者，服務業與幫傭即是最主要的項目，而其最主要前往的地區，便是臺灣，這與臺灣都市工商繁盛有甚深的關聯。⁶⁶ 如根據昭和 6 年（1931）6 月 28 日《先島朝日新聞》一則名為〈本郡女性前往臺灣的女中、傭工人數有絕對的領先〉的報導，提供了約略的數據。內容指出當時八重山郡女性前往臺灣工作計有 843 名，以普通下女 518 名最多，旅館女中（女侍者）則有近百人，傭人為 52 名。而所在的臺地都市，以臺北市最多，469 名，基隆市次之，252 名，兩地合計便超過 85%。其餘城市街則皆未滿 50 人，而高雄市排名第五，僅 27 名，占 3.2% 顯示在 1930 年代初期八重山地區的女性因為地緣與就業機會的關係，基本上來到高雄者仍甚有限。⁶⁷

但高雄港與基隆港並列為臺灣兩大國際通商口岸，稅關乃是重要機構，任職其內的公職人員多為日人，有家事服務的需求，而其家內的「下女」與「女中」便可見有來自沖繩的女性。⁶⁸ 《昭和五年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 高雄州高雄市》中，從事「家事使用人」沖繩籍女性，在高雄市有 18 名，鳳山郡有 2 名，岡山郡與旗山郡則無，顯示都市所創造出來的就業機會。而有些年輕女子並因為嚮往都市生活，因而來到高雄尋求機

64 〈犬も食はない夫婦喧嘩の 果が運河へ投身〉，《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1 年 3 月 5 日），第 2 版。

65 石川友紀，〈新聞記事にみる大正期沖繩県における移民事象〉，《移民研究》，8（2012），頁 75。

66 金戸幸子，〈1930 年前後の八重山女性の植民地台湾への移動を促したプル要因——台湾における植民地の近代と女性の職業の拡大をめぐって〉，頁 7-9。

67 卞鳳奎，〈日治時期日人在臺灣移民之研究〉（新北：博揚，2017），頁 249-250。

68 黃于津、李文環，〈日治時期高雄市「哈瑪星」的移民與產業——以戶籍資料為主的討論〉，頁 19-20。

會。如昭和 4 年（1929），有一位沖繩縣生的親川ヅメ，就被誘至鳳山街上的料理店內擔任女中。⁶⁹ 但也有如居住在旗後町、時年 22 歲的三宮城ウト，為了讓患病的丈夫返回故鄉沖繩療養，因而決定賣身於新町料理屋觀月，換取 300 圓旅費之艱辛案例。⁷⁰ 另根據金戶幸子訪談八重山地區女性耆老，即有幾位曾有高雄經驗。一位大正 4 年（1915）出生於與那國島的 D 女士，在昭和 2 年（1927）來到高雄，先是在旅館擔任女侍者，後轉至高雄州知事宅邸擔任女侍者，至民國 36 年（1947）方離開高雄，於異鄉度過長達二十年的歲月。而出身石垣島的 K 女士，則曾兩度來到高雄。第一次擔任公車隨車員（1940-41），第二次先是在郵局擔任窗口二年，接著到畜產會社擔任電話交換手（1944-46），戰後返回石垣島擔任主婦。⁷¹

而除了受僱，在高雄工作的契機也得以讓外出的沖繩女性取得專業證照。如大正 12 年（1923）出生於與那國島的 G 女士，先是經同學介紹，於昭和 13 年（1938）至臺北擔任女侍者，後進入美容師養成學校，接著至高雄的美容院修業。而從留存的合格證書，可知 G 女士是在昭和 18 年（1943）於高雄州依據〈美容術取締規則〉取得美髮師資格。當她戰後返回與那國島，便在當地開設了戰後第一間美容院，並推廣了電熱燙。⁷²

二、主要聚居地區

臨港地區提供了眾多就業機會，故吸引了有心拓展的日本移民前來，沖繩勞動者也前來聚集於此一新興地帶尋求發展。基於就業需求、訊息往來及互相援助等因素，勞動者的居住地也逐漸聚集於特定小區域內，形成同鄉聚居的居住型態。從先行研究者的觀察，沖繩人士聚落主要集中在湊町、新濱町、入船町與堀江町一帶。⁷³ 若從戶籍資料來

69 〈誘惑から 流浪の十八娘〉，《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9 年 1 月 18 日），第 5 版。

70 〈夫の爲の身賣り〉，《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9 年 8 月 6 日），第 2 版。

71 金戶幸子，〈1930 年前後の八重山女性の植民地台湾への移動を促したプル要因——台湾における植民地的近代と女性の職業の拡大をめぐる〉，頁 5。

72 沖繩県文化振興会公文書管理部史料編集室編集，〈沖繩と台湾〉，頁 39。金戶幸子，〈1930 年前後の八重山女性の植民地台湾への移動を促したプル要因——台湾における植民地的近代と女性の職業の拡大をめぐる〉，頁 5。

73 又吉盛清，〈大日本帝国植民地下の琉球沖繩と台湾：これからの東アジアを平和的に生きる道〉，頁 373-374。呂青華，〈戰後在臺沖繩人的處境——高雄「入船町」個案〉，頁 428。黃于津、李文環，〈日治時期高雄市「哈瑪星」的移民與產業——以戶籍資料為主的討論〉，頁 15。黃于津，〈日治時期高雄市「哈瑪星」社會構成之研究〉，頁 22-30。

看，移入哈瑪星的日本人可見有不少同鄉寄居於同一戶的情況。這些來自同鄉的寄居者，在初臨乍到時，可能因為人生地不熟，為求快速適應新的生活環境，因此多依賴較早移居的同鄉前輩，彼此可互相照應，以圖建立穩定生活的方式，這樣的例子從戶主下寄留多名同鄉者可見端倪。

如仲田昌英，昭和 12 年（1937）年從沖繩本籍地轉寄留至湊町三丁目 25 番地，昭和 16 年（1941）轉至湊町四丁目 19 番地，隔年轉至湊町三丁目 26 番地，昭和 20 年（1945）至湊町二丁目 10 番地。其戶下除與 2 名家人同住外，另有同居寄留有多達 12 名沖繩籍同鄉，以及 2 名九州鹿兒島人。⁷⁴而有一位太田正喜（1902-）則登記為「船夫」，其戶口下另外還寄留了 11 名的沖繩人。此外，還有像仲原保久利，其受僱於位在湊町三丁目的魚市場，除與妻子、女兒一同設籍湊町三丁目 6 番地，戶下尚另外寄留了 5 名沖繩人。另有一位具有「士族」頭銜，職業登記為「社外船タリーマニ船員」的田頭政顯（1896-），昭和 2 年（1927）從本籍地沖繩縣那霸市移入高雄田町，幾年內不斷在鹽埕町、山下町、湊町內遷移，至戰後並移至大港埔；其戶下除了家人 7 名之外，另外還寄留有 23 名沖繩人、1 名鹿兒島人，此外還僱有 4 名沖繩籍雇人。值得注意的是，從幾戶的沖繩籍戶主的戶下，都可觀察到沖繩籍移民多有相互寄留於同籍者戶籍下的情況，這似乎也顯示沖繩籍移民比較依賴原籍地的社會關係。⁷⁵

鼓山、南鹽埕一帶雖在日治時期係沖繩籍移民主要聚居地，根據又吉盛清在民國 73 年（1984）造訪鼓山漁港，仍可於附近尋有琉球人士後裔居住，惟屋內已是「臺灣式」樣貌。⁷⁶另根據呂青華在十餘年前進行的田野調查，雖然在 1950 年代仍有一戶沖繩人士居住在大禮街，但基本上當地人對於是否曾有沖繩人士居住該地已經全無印象。⁷⁷而根據筆者近期造訪所見，這些過往聚居區域現全改建為現代建築，並無留下歷史蹤跡。隨著戰後移民的遣返，加以都市的更新，相關屋舍甚至於記憶皆淡出這些地區。

74 黃于津，〈日治時期高雄市「哈瑪星」社會構成之研究〉，頁 100。

75 黃于津、李文環，〈日治時期高雄市「哈瑪星」的移民與產業——以戶籍資料為主的討論〉，頁 31。

76 又吉盛清，〈大日本帝國植民地下の琉球沖繩と台湾：これからの東アジアを平和的に生きる道〉，頁 376。

77 呂青華，〈戰後在臺沖繩人的處境——高雄「入船町」個案〉，頁 427-428。

三、生活略影

除了謀職工作，沖繩移民及其後代在高雄生活日久，亦在本地進行節慶、就學等日常活動，豐添了高雄的生活樣貌，以下列舉數例。

（一）就學

成年者或勞動者來到高雄主要尋求工作契機，若是舉家移遷或是在高雄成家者，家庭內的幼子連帶有教育需求，更有些人是因求學而來到高雄。

日治時期，高雄地區陸續設置小學校、中學校、高等學校、商業補習學校等各級教育機構，便成為沖繩籍後代可就學的選擇。以高雄州立高雄高等女學校的校友資料為例，即可見沖繩學子就讀紀錄。如第一屆畢業生的花城節（那霸市東町），第六屆的嘉平秀子（八重山郡石垣町）等。另有數位就姓名來判斷可能是沖繩子弟，惟因戶籍地址僅書寫「臺灣」，故仍需再行確認。⁷⁸

有些人士則是在家人安排下轉學到高雄求學。如大正 5 年（1916）出生於與那國島、戰後曾擔任與那國町議員的黑島キヨ，在 12 歲時被在高雄市工作的姐姐安排至高雄生活，並轉學至湊小學校（今鼓山國小），昭和 3 年（1928）畢業後留在高雄工作。1920 年代以降，諸多沖繩男女來臺藉由更換職業或通學，期望達到社會流動的效果。她的臺灣經驗，或也是促使她後來從政並積極呼籲與那國島與臺灣應進行物資交流的契機。⁷⁹

（二）龍舟絕技

划龍舟（船）是東亞、東南亞地區端午節時的重要文化活動，臺琉兩地皆甚為盛行。琉球人稱划龍舟為「爬龍」（ハーリー），在昭和 11 年（1936）11 月 17 日出刊的《海南時報》頭版，刊載了以「龍舟競賽盛況空前」為題的報導。這篇報導清楚描述了在高雄舉行的划船大會盛況，轉錄如下：

78 高雄州立高雄高等女學校同窓會，《高雄州立高雄高等女學校同窓會 會員名簿》（高雄：高雄州立高雄高等女學校同窓會，1937），頁 7、26。

79 琉球新報社編，《時代を彩った女たち：近代沖繩女性史》（沖繩：ニライ社，1996），頁 442。

沖繩水產互助會舉行了划龍舟大賽。隊伍共分為紅白藍三組，進行五百公尺的划船比賽；到了兩百公尺的地方，船隻按照白、紅、藍的順序陸續翻倒，然後原樣繼續划行；其勇壯的美技，讓觀眾不禁全部站起身來，為之狂熱歡呼喝采……

這是在描寫將船隻上下翻倒、再翻回正面的技術競賽，而旅居高雄的沖繩漁民便在海上展露了「翻轉爬龍」這樣一手妙技，令前來觀賞的人們全都大呼過癮。⁸⁰ 這種熱鬧的盛況出現在高雄的端午港祭當中，讓人不禁遙想沖繩移民在高雄的風華。⁸¹

（三）互助與抗爭

而來到新天地，移民間更發展或加入相關組合、互助會、鄉友會等，除進行交誼，更藉此維護自身權益。

除了一般的沖繩縣同鄉會、八重山同鄉會，由於沖繩移民較適應炎熱的天氣，且聘用的工資較其他日本府縣者低廉，在南洋群島地區的日人群體中反居優勢。而在臺灣，雖無這樣的優勢，但在漁業領域中，仍可見沖繩漁民在日籍漁民中占多數。故散居基隆、宜蘭、高雄各地的漁民聚落，因此得以結成漁民組合。昭和 10 年（1935），在高雄市的沖繩漁民就有約 600 人之譜，如前述便有所謂的沖繩水產互助會。然而由於沖繩漁民較缺乏資金，出資的業主與船主多半係日本其他道縣人士，而沖繩漁民則從事實際捕撈。相對處於較弱勢的漁民為保障自身權益，遂又另聯合結成組織相互援助，並於田頭政顯的策劃下，在「海人草事件」中團結並援引沖繩籍律師對抗船主與資本家（詳下節）。

（四）中繼站

高雄作為重要港市，與日本往來的船班較為頻繁，故除了在高雄地區的沖繩人士，也成為外地沖繩人士交通運輸轉乘或疏開時的中繼站。

80 松田良孝著，蘆荻譯，《被國境撕裂的人們：與那國臺灣往來記》（臺北：聯經，2017），頁 91。

81 〈高雄の港祭藝妓連の扒龍船嬌聲を張聲で張舉 1 力漕，聲援銅鑼の音も物凄く非常の盛況を呈す〉，《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5 年 6 月 11 日），第 3 版。

從高雄前往日本的案例，如出生於臺南、為戰後沖繩第一位女性律師、法官的大城（原姓：安里）光代（1932-），與其母親要前往東京探親時，便是到高雄乘船。⁸² 而其父親是出生於沖繩縣座間味村、昭和 6 年（1931）起在臺南市擔任執業律師的安里積千代（1903-1986），曾積極參與高雄沖繩漁民的「海人草事件」。

而在高雄轉運至其他地方的例子。如大正 11 年（1922）出生於那霸的宮城菊（1922-2013），她在被詢問要到南洋或是臺灣工作時，選擇了臺灣。而於昭和 11 年（1936）前往澎湖的旅館擔任侍者時，先從基隆上岸停留一晚，接著搭乘火車至高雄短暫停留，再搭船前往澎湖。⁸³ 另在戰後曾獲吉川英治文化賞、勳六等单光旭日章等殊榮，大正 12 年（1923）出生於與那國島、擔任護理師的与那覇しづ（1923-2010），她在昭和 16 年（1941）隨丈夫至澎湖居住。至昭和 19 年（1944），隨著戰情的熾烈，澎湖軍港不斷遭受美軍轟炸，因此她帶著小孩乘船前往高雄避難，而該艘船後來於乘客上岸就被擊沉，之後与那覇しづ則循著陸路前往南投疏開。⁸⁴

（五）社會事件

另偶可見一些社會案件及不幸憾事。如大正 10 年（1921）3 月，就有一位 29 歲、來自沖繩縣八重山郡石垣村的妻子金松とみ，方於該年 1 月來臺生活，夫妻都在入船町的高雄鐵工廠內工作。但某日因為家庭糾紛，夫妻間劇烈爭吵，金松とみ後竟在晚上 9 點投身運河（第一船渠）身亡，其屍體後在 3 月 5 日被發現。⁸⁵ 也有因戀愛不被承認而從沖繩八重山與那國村前來的 19 歲少女與愛人，在昭和 6 年（1931）一起逃至高雄鹽埕町尋求新天地，即便面對家人來相勸亦不願意返回與那國的事蹟。⁸⁶

在社會紛擾方面，有一位原籍沖繩縣國頭郡、32 歲的漁民金子藤一，不知因何緣故，在昭和 7 年（1932）2 月 20 日，攜刀橫臥於西子灣隧道中，後經通報被湊町派出所巡查

82 安里積千代，《一粒の麥：米軍施政下の四半世紀 八十年の回顧》（東京：民社党沖繩県連合会・1983），頁 325。

83 富永悠介，《〈あいだ〉に生きる——ある沖繩出身女性をめぐる経験の歴史学》（大阪：大阪大学出版会・2019），頁 49-50。

84 琉球新報社編，《時代を彩った女たち：近代沖繩女性史》，頁 479。

85 〈犬も食はない夫婦喧嘩の 果が運河へ投身〉，第 2 版。

86 〈沖繩から逃げて高雄で愛の巢 折角尋ね當てたら又何處へか墮落〉，《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1 年 8 月 28 日），第 2 版。

帶回管束的社會事件。⁸⁷而有一位自稱是船主的上原加奈，其實是一位詐欺慣犯，在昭和 6 年（1931），他一下自稱是來自基隆的船主，一下子又說是某地船主，用這種方式在臺灣各地行騙。今年來到高雄榮町的料理店白吃白喝，且又四處跟商店拐騙欠債，後被查出只是一個無賴混混而被捕。⁸⁸

陸、遠洋謀生

漁業是沖繩勞力移民從事最多的項目，尤其相對於沖繩海域，臺灣南方的海域甚至由高雄出發的遠洋漁業都是更有機會獲取利潤的區域。故以高雄為整備基地，吸引或被招攬而來的沖繩漁民，除投入調查等事業，後並成為遠洋漁業的主力。

一、漁業移民概況

隨著 19 世紀晚期日本開始往南海、西太平洋等「南洋」地區探查，後大正 3 年（1914），日本即以保護太平洋航路安全為由，趁勢占領德領南洋諸島，同時展開南洋群島水產業及各項初步調查，以期進一步南向拓展，日本國家勢力更正式伸入此一地區，將其視為經濟、國防、產業、貿易拓展上重要的戰略場域。此外，在新式拖網漁業引進日本，改良式機船底曳網快速發展情況下，日本也積極拓展南洋與太平洋的遠洋漁業。而此時期臺灣水產業也連帶進入轉型發展期，除持續針對漁船建造、水產加工製造、新式漁業、淡水養殖等獎勵補助外，也開始針對動力漁船靠泊碼頭及避難設施等安全需求，進行必要擴建與疏浚工程等。在人員上並有更多的日籍漁民進入臺灣南部，主要以九州及沖繩地區移民為主。而除了漁業與船舶業，並有若干沖繩勞工移民以高雄為轉繼站，再前往南洋地區從事勞力工作。

在這黑潮流經的海洋裡，搭乘突棒船的八重山群島與與那國島民與臺灣的往來其

87 〈沖繩人携刀 横臥西子灣 隧道中〉，《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2 年 2 月 23 日），第 8 版。

88 〈ニセ船主が高雄で無銭遊興捕へて見れば常習犯〉，《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1 年 1 月 19 日），第 5 版。

實相當頻繁。但這類漁業漁民應主要集中在臺灣北部的基隆與宜蘭地區，若要以較為簡單的海上動力運輸抵達距離相對較遠的高雄，勢必須繞行臺灣沿岸，難度較高。故來到高雄再前往南海者，往往是受僱以高雄為基地，再前往漁撈地，連結起「沖繩—（基隆）—高雄—南海」間的渠道。而漁民大規模的來到高雄地區，又吉清盛推斷約在 1910 年代前期。而從日治時期的調查來看，在高雄州內，漁港與漁船數量皆以高雄市為最多。根據昭和 3 年（1928）的一份報導指出，當時居住在高雄日籍漁民共有 360 名，其中以山口縣 91 人最多，次之為宮崎縣 84 人，沖繩縣者則有 37 人，約占一成。⁸⁹另從前述的國事調查來觀察，從事水產業者皆是男性。

另從鼓山區日籍人士的戶籍資料同可略見區內山口縣與沖繩縣的日籍移民與漁業有著密切的關係。如在新濱町與湊町內獨立設戶口的沖繩移民，約有 8 戶的戶主從事船、漁業相關職業，又特別是湊町三丁目的漁夫數量較多，包括西銘新勝（1887-）、安里文榮（1896-）、古波藏善助（1896-）、宮城富榮（1901-）、宮城三郎（1903-）等，他們的職業欄記載皆為「漁夫」；而登記為「船夫」的太田正喜，其戶口下另外還寄留了 11 名沖繩人。此外，還有像仲原保久利，其受僱於湊町三丁目的魚市場，除與妻子、女兒一同設籍湊町三丁目 6 番地，戶下尚寄留了 5 名沖繩人。田頭政顯其戶下除了家人 7 名之外，還寄留有 23 名沖繩人、1 名鹿兒島人，此外還僱有 4 名沖繩籍雇人。⁹⁰

雖囿於經濟能力，沖繩漁民多半不是船主，但仍可見有部分人員積極取得操作船舶專業證照，發展水上工作的另一個項目。透過高雄州舉辦的漁船職員養成講習會，從參與者的姓氏或有明確列出籍貫者即可發現沖繩漁民之紀錄。如昭和 9 年（1934）7、8 月間於高雄魚市株式會社舉辦的講習會中，從姓名推斷分別有修畢沿岸乙種二等運轉士的安里文榮，小形船乙種二等運轉士的系數原次郎、福原誠二、金城玲助，及沿岸發動機船三等機關士的東濱伊志戶等。⁹¹昭和 10 年（1935）則有推測可能是沖繩人的系數富雄與系數源次郎二人修畢沿岸乙種二等運轉士講習，城間松與宮城保正修畢沿

89 〈內地人漁業者 高雄市現在〉，《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28 年 10 月 10 日），第 1 版。

90 黃于津、李文環，〈日治時期高雄市「哈瑪星」的移民與產業——以戶籍資料為主的討論〉，頁 31。

91 〈漁船職員養成講習會〉，《臺灣水產雜誌》，234（1934），頁 43-46。

岸發動機船機關士講習。⁹²另有金城清助獲船舶職員臨時試驗合格。⁹³昭和 11 年（1936）的講習規模擴大，地點設於高雄市第一尋常高等小學校（今鼓山國小）內，此次參與講習名單並有明確列出籍貫，沖繩籍者包括伊良部勇勝⁹⁴、安里萬清、安里文榮、福原識二、系數直允、鳩間武戶、知念朝清、松本千助、仲嶺康榮、東濱伊志戶及仲真蒲戶等人。⁹⁵

二、南洋拓展

而前述來到高雄，並以之為基地前往南洋地區所從事漁業的沖繩人士，主要進行的項目包括二大類：海島的鳥類抓取與磷礦開採及漁業經營——海人草採集、貝類撈取、海龜捕抓等。

（一）海島資源採集

日人在 20 世紀初即試圖在南海進行調查與擴展，初始以抓取信天翁、白腹鯉鳥等以取羽毛進行外銷。後在基隆經商的日人西澤吉治（1872-1933）⁹⁶，更於明治 40 年（1907）占據東沙島，除抓取前述鳥類，並撈取海草、魚貝、珊瑚、玳瑁等海洋資源，更大規模著手開發磷酸鹽礦物。磷礦是在經濟上能被利用的磷酸鹽類礦物的總稱，是重要的化工礦物原料，可製造磷肥，並可用於醫藥、食品、火柴、國防……多種工業。而分布於低緯度遠洋島礁、由海鳥糞便堆積與地表海沙凝結而成的「磷酸岩」（俗稱「鳥糞石」）。此類礦產可提煉磷酸鹽類，為珍貴的化學原料，並是磷肥的重要原料。隨著日本明治維新殖產興業政策下農業以及經濟作物經營的快速擴張，對於磷肥的需求也大量擴張，擁有相當重要的市場性。故西澤氏大力經營期間，建立起「西澤島—高雄—基隆—日本」每月一至二次的物資輸送模式，並募聘了來自八丈島、沖繩……地的日籍職員、勞工 220 名，及臺灣、福州等地人員。據云相對於八丈島的勞工，沖繩勞工屬於識字率的族群。

92 〈高雄に於ける船舶職員養成講習會〉，《臺灣水產雜誌》，246（1935），頁 27-29。

93 〈船舶職員臨時試驗合格者〉，《臺灣水產雜誌》，244（1935），頁 36。

94 後曾擔任高雄市役所土木課雇員。

95 〈高雄に於ける船舶職員養成講習會〉，《臺灣水產雜誌》，258（1936），頁 33-35。

96 亦有稱其為西澤吉次之紀錄，為求一致，本文中統稱為西澤吉治。

受惠於此，西澤吉治一度得於高雄設置加工廠進行肥料加工，但後因主權糾紛，其於明治42年（1909）被迫撤離東沙島，在島上的沖繩籍移工也隨之離開，開採活動並告停止。⁹⁷

但日人對於南洋群島的探索並未停歇，讓沖繩籍人士再度有前往南洋的契機，且主要以磷礦調查為主。如大正6年（1917），先後有住在基隆的池田金造、小松重利等組團前往南沙群島探險。而與高雄有關者，則為日本秋田縣人士平田末治。他於大正5年（1916）前往臺灣，除從事土木業，後更以高雄為基地（並曾擔任高雄市協議會員等職）積極拓展南洋經營。他在大正6年時，因從事東沙島海人草採集業及沉沒船解體工作之際，連帶發現西沙群島埋藏有豐富的磷礦。大正7年（1918），平田末治與退役海軍中佐小倉卯之助等人再搭乘探險船「報效丸」，從東京出發前往新南群島（今南沙群島之一部）進行磷礦調查，船隻途中即停留於沖繩，並在當地招聘10名船員隨同，後這些船員即曾短暫停留於打狗港進行補給。⁹⁸

大正10年（1921），平田末治與廣東香山人何瑞年合資成立西沙群島實業公司，約定開採業務由日本人負責，並從臺灣招募日臺職員與勞工至西沙群島進行開採，後因廣東民間大力抗議而告終止。加以世界經濟不景氣，南洋拓展的腳步一度停歇。但隨著大東亞戰爭爆發，日本國家勢力伸向南洋地區，總督府再度展開調查，後更將南海諸島併入高雄州高雄市轄下，並積極進行當地的磷礦開發。而平田末治在昭和10年（1935）成立開洋興業株式會社，再度投入諸多調查與開發事業。昭和12年（1937），中日戰爭爆發，磷礦輸入困難，影響日本農業至鉅，因此國策會社（特種公司）臺灣拓殖株式會社透過投資方式與平田末治共同設置了開洋磷礦株式會社，計畫在南洋群島開採磷礦，該社社址即設置於高雄市湊町二丁目。⁹⁹

而較適應溫暖濕潤氣候的諸多沖繩漁民與勞工也陸續前往從事磷礦開採及與撈捕海洋資源。以開洋磷礦株式會社為例，其事業地設於多樹島，機構名稱為「西沙群島礦業所」。從昭和15年（1940）僱用職工名冊中人士姓名來推斷，來自沖繩者有12名，約占總人數的41%，主要出任中間階級的技手、書記、船員。而從數年的綜合資料中，亦

97 詳細過程可參見山下太郎，〈東沙島の沿革〉，《臺灣時報》，昭和14年11月號（1939），頁159-165。平岡昭利，〈東沙島への日本人の進出と西澤島事件〉，《地理空間》，4（1）（2011），頁1-17。

98 詳見小倉卯之助，〈暴風の島〉（東京：小倉中佐遺稿刊行会，1940）。

99 簡榮聰，〈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海南暨南海經營事業檔案概況〉，《臺灣文獻》，46（4）（1995），頁293-295。朱德蘭，〈臺灣沖繩交流史論集〉（臺北：遠流，2016），頁163-168。

可見沖繩人在運輸、漁撈、採礦技術等項，擁有很獨特的才能，為礦業所十分重要的專業群體。而為獲得足夠的人力，勞力仲介公司並積極在沖繩招聘人員，這些人員便以高雄港為中繼站，再前往開採地。惟隨著戰況劇烈，運輸及補給不易，事業至後期拓展不易，至二戰末期，沖繩勞工遂離開西沙群島。¹⁰⁰

（二）漁業經營

漁業經營的部分，大致可分為南洋的海人草、貝類、海龜等。

沖繩漁民藉由精良的泅水技術，可從事經濟作物海人草（*Digenea simplex* [Wulf.] C. Ag.）的採集。海人草為松節藻科植物，為當時重要的驅蟲藥方。由於腸道寄生蟲病主要盛行於熱帶及中低度開發國家，而慣以動物糞便為作物肥料的臺灣，蛔蟲感染率算是偏高，連帶影響宿主的健康。1920 年代後，日本衛生當局開始對學童展開驅蟲措施，讓寄生蟲患者服用煎煮過的湯汁，可收驅蟲功效，故驅蟲藥的需求大增。而海人草製成的驅蟲藥方，除在臺灣，於日本、香港、德國等地亦甚暢銷。¹⁰¹ 東沙群島一帶為重要的產地，當日本勢力擴張至南洋地區後，沖繩漁民便隨之前往，數百名漁民於東沙島上曬製、網裝海人草以供輸出。¹⁰² 海人草的採集期從 3-10 月，必須潛入海中較久，沖繩漁民可僅利用護目鏡、配戴棉質手套便裸身下海採集，於海底採集後先集中於胸前袋中後再帶至船上。由於需長時間留於海中，其他漁民技術無法如沖繩漁民精良，故採集海人草成為其專擅的項目。¹⁰³

由於南海的主權紛爭，沖繩漁民在南海的活動一度暫停。但昭和 12 年（1937）後，隨著日本軍事力量進入東南亞，重新占有東沙群島，並劃歸高雄州管理，沖繩漁民得以重新於該海域採集海人草。居所改至湊町的平田末治在此年 3 月起即接受官方委託調查東沙島一帶的海人草漁場情況，期間應係採行與沖繩漁民合作的模式前赴調查。¹⁰⁴

100 朱德蘭，〈臺灣沖繩交流史論集〉，頁 172-184。

101 〈新知識 海藻と蟲 海人草は蛔蟲除に〉，《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18 年 11 月 8 日），第 3 版。

102 平尾則人，〈謎の南支那海とわが漁船隊の活躍 南海の需要性に着眼せよ〉，《大阪朝日新聞》（1933 年 8 月 15 日），第 4 版。

103 僑務委員會第三處編，〈臺灣外銷產品簡介〉（臺北：僑務委員會第三處，1957），頁 83-85。

104 「平田末治（東沙リ—フニ於ケル海人草漁場調査ニ關スル事務ヲ囑託ス）」（1937 年 2 月 1 日），〈昭和十二年一月至三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判任官以下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檔案·進退原議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252053。

當時高雄地區的海人草相關組合有兩個，一為採集組合，一為販賣組合，地點皆位於湊町一丁目 24 番地，且組合成員都是 23 名，應係同一群人士所組成。前者創設於昭和 8 年（1933），後者則於昭和 9 年組成，¹⁰⁵ 兩者的組合長皆為平田末治。¹⁰⁶ 他與沖繩人密切合作從事海人草採集活動，並創立海人草採集組合，是一個典型的日籍出資者與沖繩漁民合作之範例。¹⁰⁷ 擔任高雄市會議員的平田在某次受訪時，曾表示他現居住於新濱町，而組合內另設副組合長及理事 5 名，成員包含日本本島、九州與沖繩各地的漁民，採集組合員每人每年繳交 5,000 圓作為費會以供運作，而販賣組合則為每口 300 圓。相關費用作為會員間互相協助、救濟之用。¹⁰⁸

昭和 10 年（1935）時，因一起漁民與船主間利益分配不均而發生的糾紛中，漁民主張船主擅自以低價售出給販賣組合，且利潤分配比例過高，無視其冒生命危險進行採撈的貢獻，遂結成了「高雄南方出漁沖繩漁民互助會」，除進行罷工，並實際採取了激烈的抗爭行動，甚至到官署抗議，過程中與警方發生衝突，展現沖繩人的魄力。¹⁰⁹ 後漁民在長期團結抗爭，加以在高雄海人草組合、沖繩縣水產互助會，以及田頭政顯委請在臺南執業的沖繩籍律師安里積千代，其直接與州知事會談等協助下，最後高雄州出面調停，勞資雙方終重訂協議，「海人草事件」終告落幕，也可見互助的成效。¹¹⁰

而沖繩漁民也採貝及捕撈玳瑁、海龜等。當中高瀨貝打磨後可作為飾品、鈕扣等加工品，是沖繩當地知名的工藝品。¹¹¹ 高雄州內並有南洋貝類採集販賣組合。¹¹² 海龜則是

105 〈海人草組合臨時總會二十日高雄で〉，《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3 年 8 月 20 日），第 3 版。高雄州，《高雄州產業調查會水產部資料》（高雄：高雄州，1936），頁 508-509。

106 「平田末治（東沙リ—フニ於ケル海人草漁場調査ニ關スル事務ヲ囑託ス）」（1937 年 2 月 1 日），〈昭和十二年一月至三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判任官以下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檔案·進退原議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252053。

107 平田末治，〈平島の海人草事業〉，《臺灣實業界》，7（8）（1935），頁 10-11。湯熙勇，〈20 世紀前期日本人在南海島礁活動〉，《臺灣學通訊》，98（2017），頁 26。

108 〈高雄海人草組合 海國男子の特異性と統制ある活動振り〉，《臺灣農林新聞》（1936 年 1 月 1 日），第 6 版。高雄州，《高雄州產業調查會水產部資料》，頁 508-509。

109 〈海人草起水時抗爭 反抗者受警官檢束 漁夫六十餘名擁到署大鬧〉，《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5 年 7 月 19 日），第 4 版。安里積千代，〈一粒の麥：米軍施政下の四半世紀 八十年の回顧〉，頁 104-108。

110 〈州の調停案件を漁夫連達に承認海人草問題圓滿解決〉，《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5 年 7 月 27 日），第 5 版。〈海人草採取問題圓滿にい解決す 天候回復次第に漁夫ら平島に向ふ〉，《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5 年 8 月 7 日），第 5 版。而關於東沙島的海人草開採與琉球漁民關係較全面性的論述，可參見湯熙勇，〈東沙島海人草的經營與琉球漁民的參與〉，發表於「2017 淡水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港口、船舶與貿易」，淡江大學歷史學系主辦。臺北：淡江大學驚聲國際會議中心（2017 年 11 月 3、4 日）。

111 〈高雄海人草組合 海國男子の特異性と統制ある活動振り〉，第 6 版。

112 高雄州，《高雄州產業調查會水產部資料》，頁 509-510。

在進入二戰時期，由於肉類物資漸為欠缺，海龜肉因而成為取代的選項之一。但由於烹煮習慣不熟悉，加以龜肉含有毒素的疑慮，在媒體上引發若干報導與討論。後即便海人草協會理事井上龜太郎攜帶捕撈的海龜一尾，前往臺北帝國大學交由農學部農藝化學佐藤正一教授進行判定，確認其捕獲的海龜係為無毒品種，且在臺灣附近海域有相當產量，而肉質可謂營養。但最後仍未能成功推廣成為蛋白質來源，無法為漁民帶來收益。¹¹³

三、鮪釣船

另一種則是以高雄為基地，從事遠洋漁業。日本領臺後，以臺灣作為前進南洋魚場的跳板，帶來了動力漁船，也引進延繩鮪釣。大正 2 年（1913），臺灣總督府開始鼓勵發展鮪釣，北部以基隆、蘇澳為主，南部則以高雄為主。捕撈動力一開始仍以帆船為主，但至 1910 年代中葉逐漸啟用機帆船，因機帆船能夠航行的距離較遠，因此漁場漸漸擴大，遂使鮪魚成為臺灣漁獲的主力之一，並輸往日本。從高雄出發的作業範圍，至昭和 4 年（1929）前後已至菲律賓、印尼沿海，後更擴及印度洋等地，加上所使用的餌料：虱目魚，在高雄、臺南有穩定的養殖業供給，比之蘇澳僅以近海為主，高雄遂反轉成為鮪釣重心。¹¹⁴

如由日籍記者松田良孝所採訪，與那國島久部良出身的大城正次（1923-），可作為一觀察範例。大城在來臺前不算具備專業的漁撈技術，反而是在臺灣南方澳方開啟漁夫生涯。他在昭和 13-14 年（1938-1939）左右來到臺灣開始從事捕旗魚的工作，並曾因為探尋旗魚的眼光銳利，從船主那裡領到了代替獎金的衣服，同時也得到了特別提供的返鄉費用。而在經過一段時間後，大城方轉移居到南方的高雄，並搭上了遠洋鮪釣船。據他表示，這是因為有位舅舅在高雄擔任「鮪釣船」的輪機長，所以接受了對方的邀請前去擔任見習船員。¹¹⁵

既以遠洋漁業為主，故出航時程自須甚久，大城正次表示，鮪釣船出港一次，就要

113 平坂恭介，〈本邦近海の海龜に就て〉，《臺灣水產雜誌》，341（1943），頁 2-7。呂青華，〈戰後在臺沖繩人的處境——高雄「入船町」個案〉，頁 426。

114 胡興華，《臺灣的漁業》（新店：遠足文化，2003），頁 162-175。

115 松田良孝，《被國境撕裂的人們：與那國臺灣往來記》，頁 91。

一個月的時間才會回到高雄，也有的船隻會離開臺灣長達四十天之久，還不時會越過赤道進行捕撈。出港時，船艙裡一定堆滿了蔬菜和豆腐等食品，見習船員便係在船上負責煮飯。船隻內雖然儲存了很多高麗菜和蘿蔔等蔬菜，但畢竟不能放太久，故當他回到岸上後，便會馬上跑去蔬菜店買上一堆菠菜，一邊泡醬油，一邊「好吃、好吃」地吃個不停。而回到港口後，大概會在陸地待上一週到十天。這段期間，要清除附在船底的海藻、修繕添補漁具，還要請油漆工重新塗刷船底。¹¹⁶而大城正次似乎也聽過「欠債的話就上鮪釣船」這句格言，實際上鮪釣船的薪資的確甚佳，讓他在短短的時間內累積了一筆可觀的財富。¹¹⁷從大城正次的經驗，反映出沖繩人士來到高雄從事遠洋漁業的原因。

柒、影響概觀

沖繩勞動移民的到來，擔任公職者在某些行政政策的擬定與推行上有著重要的角色，部分並是地方的代表人物。而民間人士對高雄產業亦帶來眾多助益，讓工業、漁業與服務業等產業得以遂行與發展。然其所發揮的影響力難有一定的指標可以呈現，但或可從戰後初期的人員留用概況來略作觀察。

整個日治時期，來到臺灣的沖繩人士有相當之數量，尤其在二戰後期，增加了沖繩籍軍人及因躲避戰爭而疏開至臺灣的平民。¹¹⁸至二次大戰結束，根據官方統計，計遣返沖繩人士 13,917 人；但根據琉球方面的資料，從臺灣返回琉球的人數統計則約達 32,000 人。出現這樣落差原因，在於臺灣的統計為官方正式遣返人數，並未包括被劃歸日僑遣返日本本土後再回到琉球群島，也不包含以漁船自行返鄉等屬行蹤不易掌握者。¹¹⁹

除回歸原鄉，另有少數沖繩人士則因各種因素留用於臺灣。而根據民國 34 年底（1945）的調查，居住在高雄市的 1,929 名琉球人士當中，留用者便有 259 人。¹²⁰至民國 35 年（1946）10 月的統計，琉球人士被規劃留用者，於高雄市者共有 225 人，人數

116 松田良孝，《被國境撕裂的人們：與那國臺灣往來記》，頁 91-92。

117 松田良孝，《被國境撕裂的人們：與那國臺灣往來記》，頁 92。

118 關於來臺疏開的概況，可參見松田良孝，《台灣疎開「琉球難民」の 1 年 11 ヲ月》（石垣：南山舎，2010）。

119 何義麟，〈戰後在臺琉球人之居留與認同〉，頁 138。

120 臺灣省日僑管理委員會編，《臺灣省日僑遣送紀實》，頁 183。

僅次於臺北市 522 人，且多於另一個原沖繩縣人重要聚居地的基隆市（155）人；而高雄縣則有 8 人。¹²¹ 至民國 36 年（1947）1 月，政府規劃留用琉球人士 285 人（當中家屬 177 名），當中高雄市 32 人（當中家屬 13 名）、高雄縣則無。高雄地區的總人數次於花蓮縣 81 人、臺東縣的 72 人及基隆市的 48 人，但花蓮與臺東所留者全為民政所用。而 32 人中以農林類（包括農業、林業與漁業）最多，計有 17 人，民政次之，計 9 人，工礦 6 人，意即與產業相關而留用者便占了約 72%。¹²²

於民國 36 年（1947）5 月最後一次奉准留用的日琉人士則計有 260 人，連同其家屬 495 人，合計 755 人。當中琉球人士 103 人（留用者 55 名、家屬 48 名），高雄市有 17 名，人數僅次於基隆市；高雄縣則無。¹²³

由於沖繩漁民在漁業活動當中扮演重要角色，故即便改朝換代，不少沖繩移民仍被留用。¹²⁴ 戰後初期關於高雄漁業的一份報導便指出：

現在高雄港之手動漁船，有兩艘此種手動漁船，全部使用沖繩人。現在留居高雄港之沖繩漁業者，有二十一名。這次沖繩人要遣返本國，此事若是實現，影響高雄港之手動漁業，而且這樣技術，難得代用。現在市營漁業公司有六名練習生，但是此數字向嫌不敷，因此市內漁業關係者，對省公署接洽將沖繩僑民留用。此事若不能實現，高雄港之漁獲量恐能急激低下，手動漁船之漁獲量，每隻平均達七、八十萬，最高達數百萬元云。¹²⁵

如前所述，沖繩人士留用於高雄市者比例甚高，主要擔任船工與漁業技術人員等，並包含其家屬。歷次留用的人數雖然不多，但與其他縣市相較，仍可略觀琉球人士在高雄的重要性。而在大量遣返過後，雖有若干琉球人士仍留在高雄擔任船工，但因中華民國政府對於琉球地位的堅持，使這些人士在臺生活與就業受到諸多限制，加以島內戒嚴

121 河原功監修編集，《台灣引揚・留用記錄：台灣協會所藏（第二卷）》（東京：ゆまに書房，1997），頁 117-118。

122 臺灣省日僑管理委員會編，《臺灣省日僑遣送紀實》，頁 156-157。

123 臺灣省日僑管理委員會編，《臺灣省日僑遣送紀實》，頁 158-159。

124 何義麟，〈戰後在臺琉球人之居留與認同〉，頁 153-154。

125 〈沖繩漁民之遣返 恐影響高雄漁業 關係者將商洽留用〉，《民報》（1946 年 9 月 5 日），第 3 版。

與東亞政治局勢的轉變，居留於臺灣者日益漸少，連帶也淡出了高雄地區。¹²⁶ 身在異地生活著實不易，形形色色的背後，都有其複雜的背景，這些在基層的沖繩移民不易在文獻上留下太多蛛絲馬跡，但從現在可見的資料當中，約略可呈現當時高雄這個移民城市的另一種風貌。而若干曾在高雄擔任公教等職者，返回琉球後持續在相關領域服務，其高雄經驗，應是未來可持續關心的課題。¹²⁷

捌、結論

高雄是個充滿活力的城市，來自四方的外來移民於不同的時間點陸續抵達，尋求新的契機。隨生活日久，進而落地生根，相互激盪互助，共榮共存，交織出諸多點點滴滴的歷史記憶。

日治時期，在同屬日本統治，消除國界區隔，加以臺灣島內近代交通設施的建立，進入臺灣的障礙與成本大幅下降。故作為躍升港市及遠洋漁業重鎮的高雄，成為尋求工作契機的沖繩人士前來一展身手的新天地。

由於眾多行政機構與學校的設置，龐大的臺灣總督府及地方行政編制，提供已有殖民經驗、且適應南方風土氣候、並具相關背景的沖繩人士得以前來高雄，從事公職（行政、司法、地方、稅關）、教職（校長、教師）、醫事與警察等各項職務，人員當中不乏士族出身者。就籍貫來看，以沖繩本島的那霸市（首里）地區最多，亦有來自八重山群島者。就性別而言，雖男性居多，但在日治後期，女性基層公務員人數也逐漸增加。

而在臺灣總督府的規劃下，打狗地區在日治初期便逐步邁向帝國南方重要港口的定位，故啟動包括鐵路、港口在內等大型建設，創造諸多建設工程人力的需求。工業重鎮的定位與貿易商業契機，則讓有心的沖繩籍人士因此前來從事代理商、出張所主任等，甚至有自行開業者。基層勞動移民在高雄也有甚大的發揮空間，男性主要為受僱勞工及

126 何義麟，〈戰後在臺琉球人之居留與認同〉，頁 151-155。

127 關於沖繩籍公務人員在戰後沖繩社會的活動，可參見坪田＝中西美貴，〈沖繩への引揚者による戦後沖繩社会への接続：台湾での公務経験者とその子女を中心に〉，《移民研究》，9（2013），頁 151-168。

從事漁業，尤其是後者，其項目包括南洋地區的海人草、貝類、海龜等採集撈捕與投入遠洋漁業，另並有事燐礦開採者。而女性則多從事服務業、家事幫傭，亦有任職工廠者。人數眾多的基層移民，主要聚集於港區一帶的湊町、新濱町、堀江町與入船町等地，且以湊町為最。若干移民並組織組合，以團體力量維護自身權益。這些沖繩移民也留下諸多生活略影，如求學、節慶等，豐添了此一歷史時期高雄地區的多元風貌。

在貨物交流方面，八重山煤炭在臺灣縱貫線運輸能量的限制、天災的干擾，及貨物稅等問題，加以南部製糖工廠的擴大對於燃料需求的提升，使海路運送的八重山炭長時期流入臺灣南部市場，成為兩地間商貿往來的重要商品。

在日治時期，陸續從日本各縣區移民來臺或短時期停留者積累眾多，彼此前來的目的不同，階級身分也各有差異，卻都對這片土地積累了豐富故事。而沖繩地區因地理位置相近，且臺灣可提供不少就業與就學契機，因而吸引琉球移民前來。但即便在臺灣各地區的沖繩移民研究已有一定之成果，專涉高雄地方者研究仍甚有限。從前述的彙整中，可看出來到高雄的沖繩移民人數或不如北臺灣的基隆、臺北、宜蘭等地，卻有著在商貿與遠洋漁業等領域的特殊性，部分沖繩籍教育界人士並以南部為主要活動範圍，顯示出某種地域活動特色，而擔任公教職者，可能也是某種地方的領導或意見人物，這些應是未來可與臺灣其他地域進行更深入比對的切入點。而部分活躍於公教及商業活動等領域、資料較為豐富的人士，未來或得以職業項目來進行區分，則是可再行作為聚焦研究的項目。

參考書目／

一、史料

(一) 書籍

- 大園市藏編 (1916) · 《臺灣人物誌》。臺北：谷澤書店。
- 大園市藏編 (1942) · 《臺灣人事態勢と事業界》。臺北：大園市藏。
- 小倉卯之助 (1940) · 《暴風の島》。東京：小倉中佐遺稿刊行會。
- 山川岩吉編 (1923) · 《最近の南部臺灣》。臺南：臺灣大觀社。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1994) · 《清代中琉關係檔案·續編》。北京：中華書局。
- 內藤素生編 (1922) · 《南國之人士》。臺北：臺灣人物社。
- 太田肥洲編 (1940) · 《新臺灣を支配する人物と産業史》。臺北：臺灣評論社。
- 杉浦和作 (1929) · 《高雄州商工人名錄》。臺北：臺灣實業興信所編纂部。
- 谷元二編 (1940) · 《大眾人事錄 (第十三版)》。東京：帝國密探偵社。
- 岩崎潔治編 (1912) · 《臺灣實業家名鑑》。臺北：臺灣雜誌社。
- 東京電報通信社編 (1990) · 《戰時體制下に於ける事業及人物》。東京：大空社。
- 林進發編 (1929) · 《臺灣人物評》。臺北：赤陽社。
- 林進發編 (1999) · 《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成文。
- 河原功監修編集 (1997) · 《台灣引揚・留用記録：台灣協會所蔵 (第二卷)》。東京：ゆまに書房。
- 建功神社社教所編 (1940) · 《建功神社誌》。臺北：建功神社社教所。
- 原幹次郎編 (1937) · 《南進日本之第一線に起つ：新臺灣之人物》。臺北：拓務評論社臺灣支社。
- 高雄市役所 (1937) · 《高雄市商工案内》。高雄：高雄市役所。
- 高雄州 (1936) · 《高雄州産業調査會水産部資料》。高雄：高雄州。
- 高雄州立高雄高等女學校同窓會 (1937) · 《高雄州立高雄高等女學校同窓會 會員名簿》。高雄：高雄州立高雄高等女學校同窓會。
- 間島三二 (1931) · 《南臺灣の寶庫と人物 高雄州の卷》。高雄：圖南社。
- 新高新報社編 (1937) · 《臺灣紳士名鑑》。臺北：新高新報社。
- 植原翠邦 (1916) · 《沖繩縣人事錄》。沖繩：小澤書店。
- 僑務委員會第三處編 (1957) · 《臺灣外銷產品簡介》。臺北：僑務委員會第三處。
- 臺灣省日僑管理委員會編 (1947) · 《臺灣省日僑遣送紀實》。臺北：臺灣省日僑管理委員會。
- 臺灣教育會編 (1939) · 《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臺灣教育會。
- 臺灣新民報社編 (1934) · 《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
- 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 (1937) · 《臺灣人士鑑 (日刊一週年紀念出版) (第二版)》。臺北：臺灣新民報社。
- 臺灣總督府編 (1916) · 《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
- 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1932) · 《昭和五年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 高雄州高雄市》。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 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1934) · 《昭和五年國勢調查結果表 全島編》。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1940) · 《臺灣警察遺芳錄》。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 臺灣總督府鐵道部 (1911) · 《臺灣鐵道史 (下卷)》。臺北：臺灣總督府鐵道部。

(二) 檔案、公報

- 「山下雄輔任鳳山廳屬」(1907年7月18日) · 〈明治四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第十一卷秘書〉 · 《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典藏號：00001340039。
- 「公學校教諭東恩納盛篤依願免官」(1907年7月12日) · 〈明治四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第十一卷秘書〉 · 《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典藏號：00001340035。
- 「平田末治 (東沙リ—フニ於ケル海人草漁場調査ニ關スル事務ヲ囑託ス)」(1937年2月1日) · 〈昭和十二年一月

至三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判任官以下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檔案・進退原議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252053。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15）・〈大正三年臺灣貿易概況〉・《臺灣商工月報》・74・頁 1-17。

（三）報刊雜誌

〈大正八年・臺灣貿易概況〉（1920）・《臺灣時報》・9・頁 58、63。

〈沖繩漁民之遣返 恐影響高雄漁業 關係者將商洽留用〉（1946 年 9 月 5 日）・《民報》・第 3 版。

〈高雄海人草組合 海國男子の特異性と統制ある活動振り〉（1936 年 1 月 1 日）・《臺灣農林新聞》・第 6 版。

山下太郎（1939）・〈東沙島の沿革〉・《臺灣時報》・昭和 14 年 11 月號・頁 159-165。

平田末治（1935）・〈プ島の海人草事業〉・《臺灣實業界》・7（8）・頁 10-11。

平尾則人（1933 年 8 月 15 日）・〈謎の南支那海とわが漁船隊の活躍 南海の需要性に着眼せよ〉・《大阪朝日新聞》・第 4 版。

高橋春吉（1935）・〈臺灣の鑛業〉・《日本鑛業會誌》・606・頁 2-11。

《臺灣日日新報》

〈ニセ船主が高雄で無錢遊興捕へて見れば常習犯〉（1931 年 1 月 19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 5 版。

〈八重山石灰と臺灣労働者〉（1906 年 1 月 27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 2 版。

〈内地人漁業者 高雄市現在〉（1928 年 10 月 10 日）・《臺灣日日新報》夕刊・第 1 版。

〈夫の爲の身賣り〉（1929 年 8 月 6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 2 版。

〈犬も食はない夫婦喧嘩の 果が運河へ投身〉（1921 年 3 月 5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 2 版。

〈本島炭業の現勢及將來（一）〉（1920 年 11 月 2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 2 版。

〈石灰と輸送費〉（1912 年 2 月 18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 2 版。

〈州の調停案件を漁夫連に承認海人草問題圓滿解決〉（1935 年 7 月 27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 5 版。

〈沖繩から水産調査に來臺〉（1936 年 11 月 12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 7 版。

〈沖繩から逃げて高雄で愛の巢 折角専め當てたら又も何處へか墮落〉（1931 年 8 月 28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 2 版。

〈沖繩人の爲めに〉（1920 年 12 月 29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 6 版。

〈沖繩人携刀 横臥西子灣 隧道中〉（1932 年 2 月 23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 8 版。

〈沖繩臺灣間の定期船〉（1906 年 4 月 1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 4 版。

〈海人草起水時抗爭 反抗者受警官檢束 漁夫六十餘名擁到署大鬧〉（1935 年 7 月 19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 4 版。

〈海人草採取問題圓滿にい解決す 天候回復次第に漁夫らプ島に向ふ〉（1935 年 8 月 7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 5 版。

〈海人草組合臨時總會二十日高雄で〉（1933 年 8 月 20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 3 版。

〈高雄の港祭藝妓連の扒龍船嬌聲を張聲で張舉 1 力漕・聲援銅鑼の音も物凄く非常の盛況を呈す〉（1935 年 6 月 11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 3 版。

〈産業視察團抵臺南〉（1913 年 3 月 29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 5 版。

〈新知識 海藻と蟲 海人草は蛔蟲除に〉（1918 年 11 月 8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 3 版。

〈福建施設と人物（四）〉（1912 年 2 月 21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 3 版。

〈誘惑から 流浪の十八娘〉（1929 年 1 月 18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 5 版。

〈輸入炭激增〉（1912 年 10 月 14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 2 版。

〈鐵道部石灰の入札と八重山炭〉（1902 年 6 月 26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 2 版。

《臺灣水産雜誌》

〈高雄に於ける船舶職員養成講習會〉（1935）・《臺灣水産雜誌》・246・頁 27-29。

〈高雄に於ける船舶職員養成講習會〉（1936）・《臺灣水産雜誌》・258・頁 33-35。

〈船舶職員臨時試驗合格者〉（1935）・《臺灣水産雜誌》・244・頁 36。

〈漁船職員養成講習會〉（1934）・《臺灣水産雜誌》・234・頁 43-46。

平坂恭介（1943）・〈本邦近海の海龜に就て〉・《臺灣水産雑誌》・341・頁 2-7。

二、專書

又吉盛清（2018）・《大日本帝国植民地下の琉球沖縄と台湾：これからの東アジアを平和的に生きる道》。東京：同時代社。

三木健（1982）・《聞書西表炭坑》。東京：三一書房。

三木健（1996）・《沖縄・西表炭坑史》。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

卞鳳奎（2017）・《日治時期日人在臺灣移民之研究》。新北：博揚。

安里積千代（1983）・《一粒の麥：米軍施政下の四半世紀 八十年の回顧》。東京：民社党沖縄県連合会。

朱德蘭（2016）・《臺灣沖縄交流史論集》。臺北：遠流。

李文環（2021）・《高雄第一盛場：鹽埕風》。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李文環、蔡侑樺、黃于津、蔡佩蓉、余健源（2015）・《高雄港都首部曲：哈瑪星》。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沖縄県文化振興会公文書管理部史料編集室編集（2000）・《沖縄と台湾》。沖縄：沖縄県教育委員会。

岡本真希子著、郭婷玉譯（2019）・《殖民地官僚政治史：朝鮮、臺灣總督府與日本帝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松田ヒロ子（2021）・《沖縄の植民地的近代：台湾へ渡った人びとの帝国主義的キャリア》。京都：世界思想社。

松田良孝（2010）・《台湾疎開「琉球難民」の1年11ヵ月》。石垣：南山舎。

松田良孝著、蕭荻譯（2017）・《被國境撕裂的人們：與那國臺灣往來記》。臺北：聯經。

胡興華（2003）・《臺灣的漁業》。新店：遠足文化。

琉球新報社編（1996）・《時代を彩った女たち：近代沖縄女性史》。沖縄：ニライ社。

富永悠介（2019）・《〈あいだ〉に生きる——ある沖縄出身女性をめぐる経験の歴史学》。大阪：大阪大学出版会。

三、期刊、會議、論文集專文

王御風（2012）・〈日治初期打狗（高雄）産業之發展（1895-1913）〉・《高雄文獻》・2（1）・頁 58-75。

平岡昭利（2011）・〈東沙島への日本人の進出と西澤島事件〉・《地理空間》・4（1）・頁 1-17。

末武美佐（2011）・〈日治前期臺灣公學校の沖縄籍教師（1895-1918）〉・《臺灣學研究》・11・頁 59-85。

石丸雅邦（2010）・〈琉球人理蕃警察職員〉・發表於「第三屆臺日原住民族研究論壇」・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主辦。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行政大樓（2010年8月26、27日）。

石川友紀（2005）・〈沖縄県における出移民の歴史及び出移民要因論〉・《移民研究》・1・頁 11-30。

石川友紀（2012）・〈新聞記事にみる大正期沖縄県における移民事象〉・《移民研究》・8・頁 57-79。

何義麟（2008）・〈戦後在臺琉球人之居留與認同〉・《國史館學術集刊》・18・頁 129-163。

呂青華（2010）・〈戦後在臺沖縄人の處境——高雄「入船町」個案〉・收於曲金良、修斌主編，《第十二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頁 419-431。北京：北京圖書。

坪田＝中西美貴（2013）・〈沖縄への引揚者による戦後沖縄社会への接続：台湾での公務経験者とその子女を中心に〉・《移民研究》・9・頁 151-168。

松田ヒロ子（2008）・〈沖縄県八重山地方から植民地下台湾への人の移動〉・收於蘭信三編著，《日本帝国をめぐる人口移動の国際社会学》・頁 529-558。東京：不二出版。

松田ヒロ子（2016）・〈植民地台湾から米軍統治下沖縄への「帰還」〉・《文化人類学》・80（4）・頁 549-567。

金戸幸子（2007）・〈1930年前後の八重山女性の植民地台湾への移動を促したプル要因——台湾における植民地的近代と女性の職業の拡大をめぐって〉・《移民研究》・3・頁 1-26。

湯熙勇（2017）・〈20世紀前期日本人在南海島礁活動〉・《臺灣學通訊》・98・頁 26-27。

湯熙勇（2017）・〈東沙島海人草の經營與琉球漁民の參與〉・發表於「2017淡水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港口、船舶與貿易」・淡江大學歷史學系主辦（2017年11月3、4日）。臺北：淡江大學驚聲國際會議中心。

黃于津、李文環（2015）・〈日治時期高雄市「哈瑪星」的移民與產業——以戶籍資料為主的討論〉・《高市文獻》・5（1）・頁 6-37。

黃紹恆（2014）・〈戰前臺琉關係之的建立、開展與客家人遷移〉・《客家研究》・7（1）・頁 109-141。

黃智慧（1997）・〈人群漂流移動史料中的民族接觸與文化類緣關係：與那國島與台灣〉・《臺大考古人類學刊》・

52・頁 19-41。

劉序楓 (2015)・〈嘉慶七年 (1802) 琉球貢船的臺灣遭難事件——以琉球使者楊文鳳的見聞記錄為中心〉・收於朱德蘭、劉序楓、廖肇亨編・《萬國津梁——東亞海域史中的琉球》・頁 115-144。臺北：中琉文化經濟協會。

蔡承豪 (2021)・〈海難救助與地方掌握——嘉慶 15 年臺灣東海岸的琉球船難事件〉・《臺灣風物》・71 (4)・頁 75-108。

謝濬澤 (2011)・〈從打狗到高雄：日治時期高雄港的興築與管理 (1895-1945)〉・《臺灣文獻》・62 (2)・頁 211-244。

簡榮聰 (1995)・〈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海南暨南海經營事業檔案概況〉・《臺灣文獻》・46 (4)・頁 289-297。

四、學位論文

許世融 (2004)・〈關稅與兩岸貿易 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黃于津 (2015)・〈日治時期高雄市「哈瑪星」社會構成之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

謝明如 (2007)・〈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 (1896-1919)〉。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五、網路暨資料庫檢索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網址：<https://who.ith.sinica.edu.tw/>。

Facebook「竹田動漫祭」(2019 年 2 月 25 日)。資料檢索日期：2023 年 3 月 3 日。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takedaas/photos/a.1565248400484389/838889066453663/?type=3&_rdr。

葉高華・〈高雄市擴大史〉。資料檢索日期：2023 年 5 月 3 日。網址：https://mapstalk.blogspot.com/2010/12/blog-post_4423.html。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附錄一／日治時期高雄地區沖繩籍人士概列表

職業別	人數	姓名
公	207	又吉盛重、三澤惇一、上地安榮、上地信子、上江州永昌、上江洲永保、上原ヨシ、上原秀雄、上原惠迪、上原繁喜、上間德正、上運天先次郎（平川先次郎）、上運天先昌、上運天智惠子、上間德正、下地惠俊、下地惠勇、下地惠教、久志助昌、久場ヒデ、大山泰永、大山景明、大宜見信一、大松義治、大城安公、大城次郎、大城盛吉、大城龜太郎、大濱方永、大濱菊江、小渡弘、小橋川秀義、小濱安吉、小灣喜康、山口宗正、山口柴子、山内久光、山内俊幸、山田タケ、山田マツ、山田敏雄、山田盛誠、山田朝常、山田節子、山田勳、山城正男、山城正義、山城曉、川平昌脛、内田政良、内間太郎、友利惠任、友寄ツル、友寄英正、友寄英真、友寄英實、比嘉スエ、比嘉太郎、比嘉政章、比嘉真松、比嘉德、北川涉吉、古波藏善助、古堅稔、古堅實、外間満子、平良宗淳、平敷朝經、永山盛治、玉那霸信福、石川千代、石川德助、石川德勝、石垣ウモト、石垣すゑ、石垣正行、石垣用人、石垣用吉、石原友賢、石堂秀、仲本正憲、仲本立、仲本則舜、仲本政子、仲地紀光、仲地廣勝、仲村渠正秀、仲村渠德次郎、仲宗根上要、伊川長壯、伊佐タミ、伊佐ミツ、伊良波長祿、伊良部勇勝、伊波頼助、宇久田秀得、宇根卓、安次嶺榮顯、安里武雄、次呂久房、糸洲銀次郎、糸満盛正、糸數昌宏、羽地惠孝、佐久本義茂、佐久本嘉聰、我喜屋宗清、我喜屋德太郎、赤嶺ヒデ子、赤嶺直、京瀧七、具志川昌泉、東入原繁、東江林助、東恩納常進、東濱伊志戸、松岡長助、松島（嶋）ハツ、松島朝一郎、波平恒芳、牧志克明、牧志克常、牧志克勤、牧謙三、知名定興、知念スミ、知念トミ子、知念ナツ子、知念良圖、花城長助、花城長誼、花城清成、花城盛永、迎里彦二、金城オト、金城浩、金城嘉政、長嶺喜治、長嶺毅明、長濱正秀、前大底多三、南風原英伯、垣花惠祥、城間恒人、城間盛秀、城間朝昌、屋富祖忠明、津野テルヲ、洲鎌實、宮平フミ子、宮良初子、宮良直次、宮良靜夫、宮里政松、宮城昌男、宮城富藏、宮城嗣郎、宮城義武、宮國定教、島本酉助、島袋順助、根本勇、桑江良起、浦崎英忠、真地良雄、真喜屋實清、真榮田義成、真榮城盛重、神村孝太郎、國場幸行、國場幸和、國頭正茂、崎山用倫、崎山並孝、崎濱方雄、崎濱朝明、野原朝良、善平朝章、喜友名朝明、喜納正松、喜納政行、棚原真宜、奥平みさを、新田保佑、源河朝仲、源河朝孝、源河朝興、漢那朝詮、福地原名、福嶺春令、與那原ヤソ、與儀喜昌、與儀喜宣、與儀實孝、儀間正良、儀間真徹、慶田城重子、慶田城孫貴、潮平辰男、親里守成、親泊英輔、濱本政雄、豐里カメ、關重雄、饒平名長伴、讀谷山朝敬、與儀喜助
教	82	上里次介、上原次郎、上原龜、上間カズ、久高友貞、大村朝正、大村朝亮、大村朝保、大嶺龜吉、山田秀、山田朝良、山田親法、山里宗祚、山城正鳴、山城榮信、友利惠盛、比嘉江治、比嘉真榮、古堅宗光、古堅宗德、古堅嘉助、外間文子、外間政善、平良辰雄、平敷好基、平識政龜、本永朝鶴、石川真德、石垣用房、仲村渠盛朝、伊江大城文子、伊良皆高平、伊舍堂孫諒、伊藝三郎、糸數弘、沖繩妙子、東恩納信、東恩納盛亮、東恩納盛篤、東恩納澄、松川浩、松村長勇、城間靜日、屋嘉ツル、屋嘉比柴子、屋嘉喜代、宮平良由、宮城竹秀、宮城萬昌、座喜味盛良、浦野卯之助、真榮里シツ子、真榮里豐太郎、高江州英正、國上惠正、國頭カメ、國頭キク、國頭トシ子、國頭正一、國頭正仁、國頭惠正、崎山用宣、備瀬マツ子、喜友名ヨシ、喜友名朝教、森山繁、渡久地政雄、新垣カスミ、新垣隆喜、新城安可、漢那朝茂、漢那朝康、與世山茂、與那原フミ、與那原正子、與那原良輔、儀保須美、儀間弘、潮平寛一郎、澤岬シズ、瀬名波起昌、饒平名知秀

(續上表)

職業別	人數	姓名
警	12	比嘉親利、仲吉朝莊、西盛佳美、知念正昌、金城長太郎、垣花恒行、宮城久安、宮城久真、宮國定喜、根間平望、喜友名安呈、當山真功
醫事	6	宜保之春、金城順英、前泊真津、宮城桃俊、嘉數實三、與世田末子
商	4 (+2)	伊地柴清、宮良永昌、桃原良毅、與奈原良哲、(與儀喜宣)、(與儀喜助)
司法	3	花城長昱、宮平良榮、高嶺方美
總計	314 (316)	

表格說明：1、表列人物順序依姓名筆畫排列。2、與儀喜宣、與儀喜助曾歷任公職與商職，故於商類以(+)表示。

資料來源：大園市藏編，《臺灣人物誌》(臺北：谷澤書店，1916)。大園市藏編，《臺灣人事態勢と事業界》(臺北：大園市藏，1942)。內藤素生編，《南國之人士》(臺北：臺灣人物社，1922)。太田肥洲編，《新臺灣を支配する人物と産業史》(臺北：臺灣評論社，1940)。杉浦和作，《高雄州商工人名錄》(臺北：臺灣實業興信所編纂部，1929)。谷元二編，《大眾人事錄(第十三版)》(東京：帝國密秘探偵社，1940)。岩崎潔治編，《臺灣實業家名鑑》(臺北：臺灣雜誌社，1912)。東京電報通信社編，《戰時體制下に於ける事業及人物》(東京：大空社，1990)。林進發編，《臺灣人物評》(臺北：赤陽社，1929)。林進發編，《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成文，1999)。建功神社社教所編，《建功神社誌》(臺北：建功神社社教所，1940)。原幹次郎編，《南進日本之第一線に起つ：新臺灣之人物》(臺北：拓務評論社臺灣支社，1937)。高雄市役所，《高雄市商工業案內》(高雄：高雄市役所，1937)。間島三二，《南臺灣の寶庫と人物 高雄州の卷》(高雄：圖南社，1931)。新高新報社編，《臺灣紳士名鑑》(臺北：新高新報社，1937)。植原翠邦，《沖繩縣人事錄》(沖繩：小澤書店，1916)。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臺灣教育會，1939)。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臺灣人士鑑(日刊一週年紀念出版)(第二版)》(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臺灣總督府編，《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警察遺芳錄》(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40)。

附錄二／列舉人士概況表

	屬性	姓名	本籍 / 出生日	學歷 / 職務	到職時間
1	公	友利惠任	沖繩縣宮古郡下地村 興那霸 1895.08.06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塩務課勤務、北門郡出張所勤務、岡山郡烏樹林出張所勤務、彰化郡鹿港出張所勤務、東石郡布袋出張所勤務	
2	公	上運天 (平川) 先次郎	沖繩縣那霸市寒川町 二ノ二四	基隆郵便局通信掛通信事務員、通信助手、通信手、臺南郵便局郵便課通信事務員、通信手、淡水郵便局通信係通信書記、遞信局監理課通信書記、臺北郵便局郵便課書記、遞信部為替貯金課書記、遞信部保險課書記、高雄州防空委員會委員、交通局高雄郵便局副參事、局長	1940
3	公	北川涉吉	沖繩縣大宜味間切塩屋村一番地 士族 1863.12.25	陸軍教導團歩兵科、沖繩分遣隊、沖繩師範學校書記官、沖繩縣尋常師範學校雇教員、沖繩縣巡查、八重山島役所在勤、鹿兒島縣尋常中學校雇教員、書記、臺東撫墾署主事補、嘉義縣主事補、臺中縣北港辨務署主記、臺灣總督府民政部通信課通信書記、鐵道部打狗出張所書記、臺北在鄉軍人會幹事	1903
4	公	伊川長壯	沖繩縣那霸市安里 三四七	人事委・事務局給與課長、高雄州警務部衛生課雇員、高雄州總務部總務課雇員、東港郡役所庶務課、岡山郡役所庶務課	1937
5	公	赤嶺直	沖繩縣島尻郡小祿村 大字榮原 1892.08.11	沖繩縣島尻郡立農學校畢 殖產局庶務課、高雄州內務部地方課屬、屏東郡役所庶務課屬、恆春郡役所庶務課屬、鳳山郡役所大寮庄長、鳥松庄長、鳥松庄米穀共同搗精組合長	1920.10
6	公	城間恒人	沖繩縣 1883.06	東京帝國大學畢 秋田縣山本郡長、樺太廳理事官、樺太廳警察部長、樺太廳拓殖部長、高雄州內務部長、高雄州青果同業組合組長、高雄州協議會員	1924.12.25

(續上表)

	屬性	姓名	本籍 / 出生日	學歷 / 職務	到職時間
7	公	宮城久安	沖繩縣那霸市古波蔵 三六八ノ一	琉球政府行政監察課長、恆春郡役所 警察課警部補、鳳山郡役所警察課警 部補、屏東郡役所警察課警部、高雄 州警務部刑事課警部、高雄消防署 長、旗山郡役所警察課警部	1928
8	公	神村孝太郎	沖繩縣那霸市久米町 二丁目 1897.06.30	熊本高等工業畢 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技手、技師、高 雄鐵道事務所工務課技師	
9	公	福地原名	沖繩縣	警察本署總長專屬雇員、蕃薯寮廳總 務課技手、統計、臺東廳庶務課技手	1905
10	公、商	與儀喜助	沖繩縣島尻郡高嶺村 字大里八四 1886.08.08	新竹廳雇、新竹廳屬稅務課、高雄州 屬、屏東稅務出張所、高雄州稅務課 直稅係主任、東港製冰株式會社常務 取締役、東港信用販賣購買利用組合 理事	
11	公、商	與儀喜宣	沖繩縣島尻郡 1886.07.08	農林省東京水產講習所漁機科畢 拓洋水產會社專務取締役、福山縣水 產講習所練習船高雄丸漁撈長、島根 縣水產試驗場技師、水產試驗場長、 農商務省技師、水產局勤務、總督府 技師、殖產局勤務、基隆支場長、臺 灣底曳網水產組合高雄支部理事組合 長、新高水產開發取締役	
12	公	儀間正良	沖繩縣國頭郡伊江村 1881.05.10	沖繩縣立中學畢 島尻郡書記、臺灣郡屬、高雄州書 記、東港郡書記、屏東市役所財務課 雇、琉球庄長	
13	教	上原龜	沖繩縣島尻郡小錄間 切具志村十四番地 1879.03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 蕃薯寮廳蕃薯寮公學校教諭	1904
14	教	久高友貞	沖繩縣首里區 1869.11.06	沖繩縣尋常師範學校畢 深坑廳新店公學校雇、鳳山廳楠仔坑 公學校教諭兼任校長、鳳山公學校港 仔墘分教場教諭	1906
15	教	山城正鳴	沖繩縣那霸市 士族 1880.11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 太保公學校教諭兼校長、鹿仔草公學 教諭兼校長、大社公學校教諭兼校長	1920.12

(續上表)

	屬性	姓名	本籍 / 出生日	學歷 / 職務	到職時間
16	教	外間政善	沖繩縣那霸市高橋町 二丁目六十四番地 士族 1892.11.28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 高雄州萬丹公學校勤務、新園公學校 校長、林邊公學校校長、九塊公學校 校長、竹園公學校校長、里港公學校 校長、美濃國民學校校長	1942
17	教	平識政龜	沖繩縣 1893.02.17	沖繩縣師範學校畢 高雄州高雄第一尋常高等小學校教 諭、訓導、鳳山尋常小學校長、屏東 市海豐國民學校長	1921
18	教	東恩納信	沖繩縣	高雄州旗山第二公學校教諭心得、教 員心得、高雄州吉洋公學校訓導、澎 湖廳馬公第一公學校訓導、高雄州手 巾寮尋常小學校教員心得、高雄州吉 洋公學校教員心得	1921
19	教	東恩納盛亮	沖繩縣首里區字山川 二百四十六番地 士族 1878.03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 新竹廳頭份公學校教諭、澎湖廳港 仔公學校教諭、澎湖廳白沙島公學 校教諭兼校長、嘉義廳水堀頭公學 校教諭兼校長、阿緱廳頓物公學校 教諭兼校長、蕃薯寮公學校六龜里 分校教諭、高雄州旗山第二公學校 教諭、訓導兼校長、高雄州吉洋公 學校訓導兼校長、澎湖廳馬公第一 公學校訓導兼校長	1920.08
20	教	東恩納盛篤	沖繩縣首里區字真和 志九六八番地 士族 1867.07.11	沖繩縣尋常師範學校畢 沖繩縣首里尋常小學校訓導、恩納尋 常小學校訓導、熱田簡易小學校兼 任、臺灣臺東國語傳習所教諭、臺東 國語傳習所太巴塢分教場教諭、臺東 廳太巴塢公學校教諭、蕃薯寮公學校 田寮分校	1906.04
21	警	上原繁喜	沖繩縣	臺南廳大目降支廳雇員、臺南廳鳳山 支廳雇員、鳳山郡役所警察課雇員、 高雄州衛生課雇員、衛生技手	
22	警	喜友名安呈	沖繩縣八重山郡八重 山村字登野城一四〇	鳳山廳巡查、阿公店支廳白砂崙派 出所	

(續上表)

	屬性	姓名	本籍 / 出生日	學歷 / 職務	到職時間
23	警	當山真功	沖繩縣首里區字金城 二二五一	臺南廳巡查、打狗支廳	
24	醫	宜保之春	沖繩縣那霸市久茂地 町一丁目六十三番地 士族 1905.03.08	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畢 警務局衛生課技手、福州博愛醫院勤 務、花蓮港醫院醫官補、臺北刑務所 花蓮港支所囑託、高雄醫院醫官(眼 科)	1941.10
25	醫	嘉數實三	沖繩縣 1907.06.11	東北大醫學部畢 內科小兒科醫、東北大內科教室仙臺 市立病院小兒科歷勤	
26	商	伊地柴清 (屋嘉比)	沖繩縣首里區當藏町 二丁目二十七番地 1879.12.25	楠梓庄協議會員、煙草賣捌人組合理 事、自動車會社重役、青果同業組合 役員	
27	商	宮良永昌	沖繩縣那霸市樋川 三九	壽商事社長、高雄壽屋文具店	
28	商	桃原良毅	沖繩縣首里區儀保町 1884.09	沖繩縣立中學校畢 八重山炭礦株式會社高雄出張所主 任、丸一洋行貿易商	1915.08
29	商	與奈原良哲	沖繩縣首里區儀保町 1894.02.01	沖繩縣立中學校畢 專賣品賣捌人、專賣局書記、臺南支 局嘉義出張所勤務、岡山酒賣捌人	
30	司法	花城長昱	沖繩縣八重山郡石垣 村宇新川八番地 士族 1881.05.25	沖繩縣立師範學校、法政大學專門部 法律科畢 沖繩現八重山郡大川尋常小學校訓 導、兼任八重山島高等小學校訓導、 那霸區高等小學校訓導、八重山郡竹 富尋常小學校訓導兼校長、東京市山 伏町尋常小學校訓導、東京府南葛飾 郡砂町尋常高等小學校訓導、臺灣總 督府法務部民刑課囑託、臺北地方法 院判官、臺南地方法院嘉義支部判 官、臺北地方法院宜蘭支部判官、臺 南地方法院高雄支部判官	1934.07.15

(續上表)

	屬性	姓名	本籍 / 出生日	學歷 / 職務	到職時間
31	司法	高嶺方美	沖繩縣八重山郡 1883.02.18	沖繩縣師範學校、私立中央大學法 科畢 高等法院上告部判官、八重郡大川尋 常小學校教諭、東京市練成小學校訓 導、沖繩縣大濱小學校長、石垣小學 校長、宜野灣小學校長、辯護士試驗 及弟司法官試補、判官、府法院判官 (臺北地方法院)、高等法院覆審部 部長、新竹支部合議部部長、新竹法 院長、高雄地方法院長	1940.12.20

表格說明：1、本表所列者，主要以從事司法、公教、醫療、警務與商業等履歷較為詳細者。2、到職時間係為擔任高雄地區職務之時間。3、出生日及到職時間未詳者予以從略。4、為便於瞭解人物活動概況，亦一併列出其在高雄以外之任職經歷。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SIUNG MUSEUM OF HISTORY

